



夹起一片故乡情

马文驹 亚华文作家协会出版

梁志庆 著

868.716

LZQ

C.2

夹起一片故乡情

梁誌慶著



NC00016882



后
马来西亚华文作家协会出版

目录

- 1 序（一） / 姚拓
3 序（二） 满园春色读华章 / 吴岸

1 .

- 9 书话
12 鸟语
15 收割曙光
16 菊
18 故乡的小河
20 种爱的人
21 咖啡店
23 仰天长啸
25 好个童话
27 金龙鱼
29 夹起一片故乡情
34 兰屿萍踪

2 .

- 41 文学的探索
- 51 关于写新闻诗
- 59 那挥动的左右手
- 67 泛游在散文的长河上
- 83 散文的抒情、表意和状物艺术
- 95 丰子恺的画笔散文
- 104 丰子恺的儿童漫画

3 .

- 111 当前马华文艺工作者的困境
- 116 荡起双桨
- 119 马华文学运动的再出发
- 127 文学团体与马华文学
- 142 芳草奇花总一春
- 150 风物长宜放眼量
- 154 犁出校园文学的春天
- 159 “五四”七十年
- 160 花开的容颜

167 后记



26.1.1989作者与余光中教授摄于演讲会上。



29.7.1984作者（左一）留影于柔佛州峇株“马华文学史料展览”讲座会上。作者主讲《文学团体与马华文学》。

序

姚拓

今日读梁志庆先生的《夹起一片故乡情》，其惊喜之情，真有“士别三日，刮目相看”的感觉。

令我惊喜的第一个原因，是在他这二十八篇的短文中，发现他的学识根基已相当深厚，不论是散文抒写、论文撰述或上台讲演，均可见到他的渊博功力。由此证明，这三十年来，他阅读了各门各派现代文学的作品，尤其是散文与诗，很有可能是“读书破万卷”。现代的马华文坛，正需要像梁志庆这样的人才！

第二个令我惊喜的原因，是志庆不论在散文或论述中，均有独到的见解，如《泛游在散文的长河上》有以下数言：“文可以载道，文也可以不载道，但必须有美。凡真的都很美，凡美的都很真；情到真时物亦有情，那是真情流露，文学的感染力就产生出来了。”这一段话，也正明了志庆已不拘囿于一门一派的学说。他以广阔的心胸，和兼蓄并容的态度，去接待文学之神的降临，所以他才能在他的文章中，流露出睿智与灼见。

第三，志庆几乎在每一篇文章中，都会有形或无形地流露出他的同情与爱心。而这同情与爱心，也正是医治现代社会的有效药方。诅咒、责骂与讥讽的文字，固能发聋振聩于一时，但亦有可能使陷于泥淖的人们更不肯自拔，甚至驱策

其越陷越深。同情、博爱，再加上乐观与耐心，也许要经过几十年或许几百年的努力，才能把这个乌烟瘴气的世界，改变成美丽的天堂！其实，人类在世界舞台上历史很短，也很年轻，有文字可记、有物件可证的历史，也不过五六千年而已！所以说，凡是有志于文学的人们，都能像志庆一样，在默默无闻的生涯中，从事无酬无报的文学工作，这样才能一代一代相传下去，也许这就是人类的曙光。

在以上的短文中，我不免对志庆有溢美之辞。事实上，是我衷心对他以及他这一代写作人的期望。但愿我们这一代及后一代的后一代互相勉励，让马华文坛变得更加美艳，更加鲜丽！

满园春色读华章

吴岸

梁志庆兄要我为他的新著《夹起一片故乡情》作序，我在今年三月间就接到他的书稿。现在已经是六月中旬了，才提笔涂写，很感抱歉。

这本书共分三辑，第一辑收集作者的散文近作。第二辑是作者的文学创作理论。第三辑是关于马华文学问题的讨论文章。全书的内容虽然杂一些，却可让读者在欣赏作者的散文艺术的同时，也了解他的文学观。

梁志庆是马华文坛上知名的散文作家。他的散文，给人一种朴实清新的感觉。他笔下的景物，宛如一幅幅淡淡的彩墨画；他笔下的事物，也多是一些家常小事。然而这其中又都隐含着作者对生活的热爱，对人类新的一代的关怀，在不经意中，向读者揭示了积极的人生哲理。所以，在他的散文中，那怕是一条平凡的小河，也可以成为他长大后“入水能游”的生命的动力；而一位在橡林下锄土种菜的老妇人，也成为一个人“种爱的人”。

梁志庆又是一个对生活与周围环境观察入微的作家。你看他这样描写乡镇的小咖啡店：“待你坐定之后，你会听到一炉热水的滚动声”。这种观察何其敏锐。在一篇题为《鸟语》的文章中，他的观察又何其细致：“听鸟啼晓在清晨四时到六时之间最好，七时还不错，八时过后，鸟儿饱食慵懒，

歌儿就唱得不起劲……这也和人一样，在有点饥饿时声音最激越，如果已吃得肠胃饱胀，一副三家村冬烘先生的样子就显露出来了。”

作者不仅对周围事物观察入微，同时在心里的感受也是极其深刻的。在写《夹起一片故乡情》一文中，他这样写道：“单身出外的人，在异地受到同胞簇拥时，浓浓的乡情温暖了人心。再见桌子上已摆好一双双筷子，使人感到宾至如归，游子早把乡愁夹掉了。”这又何等的有人情味啊！

梁志庆对散文艺术有精湛的研究。本书中的《泛游在散文长河上》、《散文在抒情、表意和状物的艺术》等文，都是他对散文创作的精辟论说。我上面只谈一点读他的散文后的感受，对他的艺术造诣，就不敢在这里班门弄斧了。

身为小学老师的梁志庆又是马华文坛上辛勤的园丁。他耕耘的是儿童文学，那苗圃就是一群天真活泼的孩童。他已经耕耘了二十几年，栽培出满园的春花和遍地的芳草。本书也收入了他在这方面的论著，其中如《犁出校园文学的春天》和《花开的容颜》，都有他对儿童文学的真知灼见。

而我最佩服的是他那种对文学事业永远乐观的态度。你看他如何看待马华文学的前途：“虽然我们慨叹时下本地的语文水准越来越低落，读书的风气有如家道中落。……可喜

的是还有许多青少年不为物役，在迷蒙的马华文艺河流上荡起双桨，向前划去！”

作者在文学上的成就以及他对马华文学事业的乐观态度，来自他的一贯的不亢不卑的文学观。梁志庆珍视马华文学以往的成就和优良传统。时至近日，还有人在嘲笑马华文坛“经典缺席”，但是早在一九八五年的那篇题为《风物长宜放眼量》文章中，作者就指出：“六十多年的马华文学，自然不能和具有几千年的中国文学相提并论。可是马华文学仍旧有很多优秀的作品，它留存的时代风貌，民族拓垦的精神和文学的基业，不应该为他们的传人所否定。”

梁志庆对马华文坛上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文学之争，也一贯以客观的态度与发展的眼光来看待。他看出两种创作方法各有优缺点，并指出吸取两者之优点而相互融合的重要性。他说：“真理常常存在于两个针锋之间；真理再向前跨进一步就是荒谬。”他认为“文学的取向争论，唯有在融合之后，冲力与抗力才会消失，产生新的文学面貌。”

也正因为如此，在创作方法上，他一方面坚持走文学反映人生反映社会的现实主义传统道路，另一方面又不断地吸取现代文学的表现手法和技巧。他认为在吸取外国的新经验与新手法的过程中，马华文学又必须不失其独特性。因此他

说：“马华文学与世界文学相互交会之下，当以达者为师，从而提高自己的创作水平。只要不陷入别国的文艺路线，当可保持马华文学的独特性，站立马华文学的形象。”

而最可贵的是，不论文学技巧如何发展和创新，作者始终坚信马华文学不能脱离马来西亚的社会现实，它“一向没有离开社群”，“一向关心社会”，它将来也不能离开社群，也必须要关心社会。

也正是本着这种“风物长宜放眼量”的远大眼光和宽阔胸怀，梁志庆二十多年如一日地在马华文坛默默耕耘，终于耕出了满园春色，写下了篇篇华章。

一九九二年六月二十一日于古晋葛园



单身出外的人，在异地受到同胞簇拥时，浓浓的乡情温暖了人心。再见桌子上已摆好一双双筷子，使人感到宾至如归，游子早把乡愁夹掉了。

书话

我小时候爱读《三国演义》，深受罗贯中大笔的濡染，对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枭雄人物曹操颇为痛恨，和他势不两立。那时我满脑子都是匡扶汉室、一统汉朝的遗老遗少的思想。长大后，读到一篇短文，说某地方有一间小吃店的老板，也酷爱《三国演义》。有一天，他为了赤壁之战曹操所带的兵马多少，和客人争论不休。他还翻书点算兵马，以正视听。另一个客官告诉他豆腐给烧焦了，他就是不理，还愤愤地说：“人马都少了五六万，烧坏一锅豆腐又算得了什么！”我读完不禁莞尔，也想起晚明张岱的《湖心亭看雪》一文中，那位舟子的喃喃之语：“莫说相公痴，更有痴似相公者”。

爱书的人，对书的感情有时是不可理喻的。

南洲诗社社长周庆芳博士藏了一本黄蘗山先生的诗集：《天南吟草》。这本诗集於1927年在本地出版，周博士在五十年代回去中国时带了诗集同行，重回麻坡时又把它携带回来，算一算，这本诗集给周博士珍藏了55年。周博士现年七十多岁，他对诗集的感觉是见书如见人，吟诗如与故友酬唱；两人虽已阴阳相隔，但精神上还是互相沟通的。正如我们读古人的书，也与古人在精神上相通一样，更何况文学是承先启后的，兰因絮果，一脉相承。对于文学这一条长河，恰如杜甫的诗句所写的：“尔曹身与名俱死，不废江河万古流。”

书会流传，正因为每一个年代都有它的知音人。赠书予知音人，就好像钟子期遇见伯牙，交谊愈久弥笃。

爱书的人大都有买书狂，走进书局，就想把所有的书都买下来，奈何阮囊羞涩，不能力拔书山，只好改以蚂蚁运粮式进行，早晚到书局搬书回来，如此搬运既久，橱里、桌上都堆满了书，床头床下也塞满了书。这些藏书又给蠹鱼充饥，还给老鼠纠众落草。这时爱书的人又要搬书清理一番，忙得不亦苦乎，却又甘之如饴。

书有时也是很累人的。

遇到战乱时，你会发现书本是很难搬动的东西，也不如物质粮食实惠。如果其中有些是禁书的话，白纸黑字，等於向抓权的人招供认罪，不免身系囹圄。文艺前辈林潮先生说，他在战前购买的马华文艺书刊，在日军南侵时，为了避免文字狱，早就烧之殆尽，原来中国在抗日时期，马新的文艺工作者和华裔同胞不但在物质上、金钱上和精神上都大力支持中国抗日运动，甚至揭笔起义，对日本的穷兵黩武的行动，进行文伐笔诛，载之於书刊上。他说烧书既痛苦又费事，如果不拆开书页，就不能把书烧到书纸灰飞烟灭。烧不完的书只好丢到树林里去，让它物化。林潮先生最舍不得毁弃的是《鲁迅全集》，为求他日收归己有，他就特意把它装进火水桶内，

再埋在林间地下，埋好之后，夜间上床，仍然悬念那套书。第二天他又偷偷前往检视，一看之下，鲁迅全集已被渗内桶内的水弄湿了，不禁唏嘘慨叹起来。很多战前马华文学的书刊，都遭此厄运。今后对保留马华文学的作品和刊物，我们实在应有妥善的办法才好。

今年，首都的中华大会堂为了举办马华文学史展，在搜索以往的马华文学书刊方面，特别是战前的书刊，相信要花很大的人力，身为华裔的，更应该热烈支持这项活动。今年九月初，为帮忙搜集马华文学作品的刊物，我曾和年红兄、方理兄以及史展的其中两位负责人黄崖和王兴文两位先生会见了林潮先生和周庆芳博士。我与年红兄又先后会见回国省亲探友的李冰人博士，要求借出他的一些藏书以供史展之用。九月十七日，我收齐了南洲诗社的诗集、李冰人博士的文学期刊和手稿，连同南马文艺研究会的出版物等等，在装箱送上去之后，有感於书的流传、收藏等事，写下这几句话。

7.10.1983 南洋商报商余

鸟语

早起在园林里倾听鸟儿啼晓，那时清气盘空，声乐飘飘处处闻，使人物我两忘。鸟啼声在上下左右，又自远而近地传来，都是天籁啊！

听鸟啼晓在清晨四时到六时之间最好，七时还不错，八时过后，鸟儿饱食慵懒，歌儿就唱得不起劲。可见鸟在精神饱满，又带几分饥饿时，才唱得振奋。这也和人一样，在有点饥饿时的声响最激越，如果已吃得肠胃饱胀，一副三家村冬烘先生的样子就显露出来了。

在城市，有的是高楼大厦的森林，见林不见树，偶而长着几棵树木，有如沙漠中的绿洲，难能可贵。这几棵树木，给鸟儿择其善鸣者而假之鸣，立刻变得很有诗意。城市的人来窥树下，但见一鸟引吭高歌，忽又声残过别枝，跳跃其间，观赏者的一颗心也跟着它跳跃奔驰，不可禁止。偶而见到一群小麻雀飞落阶前，在石阶上下，跳出唧唧复唧唧的高低音符，人间难得有此清音，主人可就倒屣相迎了！

闻听之不足，有的人就饲养起鸟儿来了。他们把鸟笼挂在屋檐下，朝夕看鸟，听几声“咕咕”和“啁啁”，便伸出友谊之手逗着它们玩，口里也跟着发出“咕咕”和“啁啁”之声，两相怡悦。

你听过学鸟叫的口技表演吧！你一定佩服表演者的天才，

他竟能够像鸟儿一样叫得婉转动听。

飞禽家就有说鸟话听懂鸟语的本事，以前我们听过古代公冶长懂得说鸟话听鸟语的本事，飞禽家就是现代的公冶长，那是他们从研究中得来的成果。

飞禽家说，鸟类的语言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求偶声，声音清晰悦耳，充满感情的呼唤。第二类是惊奇声，声调短促而尖锐，表示它们发现危险的事情，发出飞逃的讯息。第三类是教导声，声音柔和亲切，用来教导幼鸟飞行或觅食之用。飞禽家深谙鸟语，又以爱心和小鸟建立起感情，他一走进园林，发出鸟语，马上引来鸟群飞舞在他的左右，和飞禽家吱吱喳喳起来，像是和老友记闲话家常似的。

人学鸟语，鸟也学会说人话，这似乎也是一种感情交流。养鸟的人，以爱心取得鸟儿的信任之后，它就会跟随主人，不再飞走。主人教鸟儿说话也是常见的事，最常见会说人话的鸟类有鹦鹉和印度八哥等等。我们也常在影视上见到动物的明星，包括鸟类明星。鸟类明星会说人话，会做很多种动作，十分机灵，红过普通的男女明星。我也在本地的一户人家见到他们所饲养的一只印度八哥，这只鸟见人会叫“老板”，会问“你要什么？”的马来话，还会吹口哨，很有趣哩！

“含情欲说宫中事，鹦鹉前头不敢言。”这是唐朝朱庆

余《宫词》七言绝句中的一句。鹦鹉效舌，已是众所皆知的事。宫女本想与友人诉说宫中事，一吐幽怨之情，但碍於鹦鹉当前，欲言又止，积郁无处渲泄，真是苦闷极了。她怕的是鹦鹉学话，会引来口舌之灾。这种情形，好比老百姓在某种政权下，不能畅所欲言，有着同样的苦闷啊！

10.4.1984 南洋商报商余



收割曙光

天色渐渐地亮了，祖国的儿女，赶着上学去。他们要收割在草场上从小草和树木中长起来的阳光。

他们一个个、一行行，排成一个长方形的周会。

他们站在草场上，肃立在旗竿前，要向祖国敬礼。

国旗徐徐的给升上来。太阳也徐徐的给升上来。国歌缓缓地他们的口中唱起，国旗翻滚着阳光的波浪，拍和着国歌而扑扑作响。

花园里的花朵，都开口唱国歌；校园里的树叶也跟着高声歌唱。这时，城市里、椰林下、渔村内的各民族儿女也都齐声合唱国歌。他们唱出宏亮的国歌，向祖国致意。

祖国静静地听着献歌，接受儿女们的敬礼。

国歌像月光在流泻，透入各民族心房的窗纱，驻守着爱。

大合唱之后，国旗已经升上旗杆上，招展着一面面的阳光，竖立起一道道的曙光。

祖国的儿女，早把阳光收割了，满怀地抱着回去。

3.1.1987 南洋商报商余

菊

学年结束了，毕业班的小同学们，唱出友谊万岁的歌声泪影。而时光老人，却喜滋滋地把他们接走了。

也许是为了弥补我们在刹那时的感情扑空，时间老人又把另一批校友送回校园来。“似曾相识燕归来”，这一群候鸟又栖息在校园内，吱喳着心曲。看他们显露逐渐丰满的羽翼，远去程门之后，终归要展翅翱翔的。年轻的心啊，散发出蓬勃的朝气来了。

——这是二十四年来在我眼前不断再现的情景。

一九六三年，我从师训学院毕业出来，到东海岸丰盛港的培智学校执教；我不是候鸟，却在这里栖迟了一年。在季节风中，细雨催发新绿，天真活泼的祖国儿女，也像新芽一样地在抽长。海岸外前浪推后浪，惊涛拍岸，开出哗啦哗啦的浪花。

从此以后，我每天都和一大群儿童相处在一起。童心使他们变得活脱，好奇使他们喜欢掀看趣味的事物，我仿佛置身于苗圃前，当起园丁来了！

二十四年来，虽然我易地三迁，但是处处可见健儿竞相攀越大汉山的脊梁，而钟声仍旧嘹亮。

每当爆竹报春讯时，我会收到几张从丰盛港培智学校校友寄来的贺年卡。二十四年过去了，现在，他们大多学而有

成，在各行各业做事。是的，下一代已经长大成人了，时光老人馈赠予积极儿女的礼物是丰厚的，对于消极的就不是。

向来，我就和文学结缘，自己又在文艺团体内活动，自然有机会和青少年们接触。在文艺活动中，我看到长辈口授机杼，青少年耳闻笔录的图绘，这不就是老僧传经的塑像吗？青少年在汲取文学的精神营养而提升了人生，延续传统。我更愿意为这传送薪火的小工作上尽力而为，使文学像长明灯一样，永不熄灭。

生命在起、承、转、合中完成篇章，时序是日新又日新的书页。步入中年，我开始了人生的第二个阶段。时光老人送给我一副眼镜，要我更清楚地探看人生。

在生活道路上，太阳、月亮和星星，一直是人们所仰望的对象，也是维系人心的力量。我想：当不成太阳的，可以当月亮；当不成月亮的，最少应该当星星。因为星星有光芒，可以指引方向。

陶渊明采菊东篱下，在悠然望南山时而释怀了！我则在掀盖加水时，看到满壶再盛开的菊花而欣喜欲狂！

12.1.1987 南洋商报商余

故乡的小河

故乡的小河是一条平凡的小河。

淡淡的日子，燃烧的艳阳天，小河淌着流水。

不知从那一年开始，小河之水就在流动了。它从东流向马六甲海峡，河水流进海里，就在海上激荡起来。

小河的两岸成为我祖先居住的地方，河流就是水道。那是几十年前的事了，我的祖先和父老们就来这里开垦土地。现在你看到的椰林、橡树林和油棕林里的树木，站成一行行的风景线，向着祖国的晴天欢呼，这些都是祖先们的劳绩。

小时候，我看见祖先们在暮色苍茫中拾芭烧柴的图绘，稍大后还看见父老们荷锄晚归的情景。刻苦耐劳和勤俭持家的美德改造了自己和民族的命运。

有的父老以捕鱼为生，他们从中国南来之后，就在这里定居下来。他们沿着小河荡起双桨，出海捕鱼去；然后划动小船，载回捕获的鱼儿。从桨上溜滴下来的都是他们的汗水啊！他们的耳边总有浪声风响，身体一定带着咸腥味。

渔家的日子正如小舟划开水面而微荡起两道水纹，过后又平静如故。在故乡的小河上，没有渔舟唱晚的诗境，也没有大河落日圆的景观。他们的乡音却带来了传统文化，成为下一代的精神补给。

而故乡的小河，也是我们儿时嬉水的地方，倾斜在小河

上的椰树干，成了我们嬉水时的跳板。我们在水中悠游，溅起快乐的水花。游倦后的我们，在椰干上站成一排麻雀，吱喳不停。清风送爽，不屈的倾斜椰树仍然仰首看天。

现在，我入水能游，那是故乡的小河教会我的，我感谢它，我怀念它。

远了，故乡的小河！多少年来，它常常从我的梦境中流过！

13.10.1988 星洲日报星云
第26期《亚洲华文作家杂志》转载

种爱的人

淡淡的日子，橡胶树开满细小的繁花，橡树林下有个老妇人，正在举锄翻松泥土。老妇人的家就在橡树林的附近，却爱莳花栽菜。她屋旁的一园蔬菜就是她种出来的；她屋前路边的花树，也是她种出来的。

她为蔬菜和花树施肥、浇水和除虫害。污黑的沟水、火烧土和鸡粪都是菜圃上的肥料，污黑的东西培养出鲜美的蔬菜和美丽的花朵。绿油油的蔬菜和鲜艳的花朵，给阳光抚慰过，给水份滋润过，也给老妇人的手扶植过。它们吸收了肥料，都长得那么鲜美。

蔬菜养活别人，花朵美化大地。老妇人爱土地，莳花栽菜也是种爱呀！

每当我走过老妇人家门口的那条小路时，我就看见蔬菜在茂长，它们一畦畦地高唱青春之歌，和着篱笆上牵牛花的喇叭声。路旁的小花也迎向我来，舞动看小手，跳小星星的舞蹈给我看哩！

有一天，我又走过那条小路，一样的青菜，一样的花朵，我却听见此起彼落的橡实爆裂声。啊！那些不起眼的橡实花，却结出有响声的果实来，真好！只怪阿婆，怎么老是默默地耕耘，好歹也不说一声！

14.9.1988 星洲日报星云

第26期《亚洲华文作家杂志》转载

咖啡店

在漫长的旅程上赶路，车到乡镇时，你总爱在咖啡店歇脚。你会在这里喝一杯咖啡，再抖落疲惫，擦亮眼睛，又赶另一段路程。

乡镇的咖啡店是朴实和简单的，几张桌子，几把椅子，还有一些小食什么的，贵客请便。待你坐定之后，你会听到一炉热水的滚动声，店主人就用它为你泡出好咖啡来。

啜一口热腾腾的咖啡，环顾左右，早有村民三五人，闲坐话家常。土产的收成，时事的演变，邻里的事故，都成为他们的话题。这里有村民的刍议，也有百姓的申诉，当官的如果微服出巡而到咖啡店来听听他们的话，一定能够充分了解民间的疾苦。

乡下的咖啡店，是村民聚会的地方。他们来这里享用香喷喷的咖啡，更重要的是得到生活的乐趣。不论是一日之晨，或是工余之后，他们都喜欢到咖啡店来聊天。他们无拘无束地畅谈着，飞传快语。

乡下的咖啡店的大门永远是敞开的，宾至如归。待到老树挂上月钩，开满一树繁星，大家才兴尽而返，借着凉风揩汗回家去。

如果你是住在城市里的，生活在紧张又忙碌之中。车辆奔驰在蛛网也似的街道上，你虽然没有因为“大道以多歧亡

羊”而迷失自己，但有时却会在人群中高喊寂寞。你或许会想起白居易的诗句：“行路难，不在水，不在山，只在人情反覆间。”于是，你会偷得一点空闲的时间，和三两个好朋友到咖啡店去共度欢乐的时光。

你还可以在叠罗汉似的高楼下，找到咖啡店，品尝友情的芬芳。我知道你还是个善于观察事物的人，在喝香浓的咖啡时，也在观看人间的众生相。

这些事儿，你和我都像极了，我们都染上咖啡瘾啦，也常到咖啡店去喝一杯哩！

15.9.1988 星洲日报星云

仰天长啸

一九八八年八月三十日我国第三电视台播映“阿富汗抗战”纪录片，片中描述阿富汗游击队抗苏实况，壮怀激烈。

苏联于一九八〇年年开军入侵阿富汗，扶持卡马尔傀儡政权，控制了阿富汗国。由于政府实施苛政，使阿富汗人民饱受苦难的折腾，于是，阿富汗游击队起而抗之，战火就蔓延开来了。

苏联军的炮弹炸在村庄上，爆在山地里；屋宇为之倒塌，山石为之崩裂。破碎的家园里，横陈着尸体，迷漫着硝烟。

阿富汗的人民噙着眼泪，救治伤者，埋葬了死去的同胞。他们无家可归，只好找寻可以遮阳避雨的山洞和陋屋栖身。有的流离失所，成为难民，在山区的生活线上受尽痛苦的煎熬。

是谁破碎了他们的国家山河？

是谁毁灭了他们的庄园？

是谁杀害了他们的同胞？

于是抗苏游击组织了起来，人民加入了游击队，壮大了作战部队。

他们有一个共同的信念，要为自己、为正义、为反侵略而作战到底。

他们也要为国家和民族而作战至死。

他们相信上苍是站在他们这一边的。他们在战地上祈祷，祈祷上苍助他们一臂之力。

回教的长者更站在山顶上，对上苍诵经、祷告。山高，人站得更高；声大，感召力更大。那些仰天长啸者的剪影，站立得多么高大。

尽管苏联军队的武器精良，但游击队却敌忾同仇，斗志如虹。坚定的信仰和同胞的爱都凝结成他们的战斗力量，愿意生死与共。

过后，苏联军频频受了重创，敌伪政权的阵地也给火箭炮炸坏了。他们向挺进，要把苏联军队逼出国境。

诚可动天，诚可感人；精诚所至，金石为开；这是定律。
16.9.1988 星洲日报星云

好个童话

这是一个小故事，发生在美国的拉斯维加斯村。

那是多年前的一天，村民发现一只中箭怒飞的水鸭，多么顽强的生命，不屈地求生存！村民兴起了同情心，都要救治那只水鸭。他们费了很大的气力，才活捉了它，再送去兽医局动手术，为它取出箭来。水鸭给救治了，当伤口痊愈之后，村民释放了它，让它展翅高飞。水鸭快乐地飞去了，留给村民的是救鸭子的美谈。他们还给那只水鸭取名“唐娜鸭”，编成像童话的故事说给别人听。

救治唐娜鸭的人都是好生之德的人。

有好生之德才有爱，万物都因为有爱而延续了生命。

春花秋实，那植物对爱的体现。摇篮里的宁馨儿，在父母的爱护下成长起来。有了爱，生物才不辞辛劳去助长生命，去延续生命。

为社会提灯的人，他们都有爱心。他们都愿意用自己的生命之光去照亮别人。

蓝丁格尔提着风灯去治疗伤兵，在黑夜里，她的生命之光是那么明亮啊！

有了灯，人间才有光明；有了爱，世上才有温暖。

生命是顽强的，就像那中箭还飞的唐娜鸭，要另找一个地方活下去。

石缝间会长出劲草，那是生命的不屈使然。

给困境中求生的人伸出援手，就是雪中送炭，给别人温暖。

唐娜鸭童话般的故事是一个动人的故事，愿这个故事流传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去！

13.10.1988 星洲日报星云

第26期《亚洲华文作家杂志》转载

金龙鱼

金龙鱼在七十年代行正好运，大发特发。用“发发发发”四个字来形容它的运程，最为恰当了。

“发发发发”这四个字，也是我族的最爱。君不见今年8.8.88那一天，有那么多的人为求“发发发发”的好意头而忙乱了一番。

金龙鱼出身于我国原始森林的小河和湖泊里，曾是原住民用来煮咖喱送饭的佳肴。数年前，养鱼成为时兴的玩意，鱼场商人引荐了金龙鱼之后，竟使它平步青云，位至极品。

金龙鱼跃过龙门之后，连带青龙鱼、银龙鱼、红龙鱼的身价也连升三级。由于龙鱼成了人们抢购的对象之后，鱼场商就从印尼，美国及南美洲某些国家输入鱼儿。其中正金红龙最值钱，八公分长就值三百元；七十分公长的可值一万八千元左右。

为什么人们热衷于养金龙鱼呢？

有人欣赏它的金鳞闪光，英姿焕发，有帝王相。有人相信它能生财辟邪，带来荣华富贵。有人佩服它扑杀猎物的技俩——快、狠、准，又干得干净利落。

就这样地金龙鱼成了财神爷，也是经济奇才。

鱼场的商人说，买一条小龙鱼，可以赚两百元。

养买金龙鱼的人说，他买进鱼苗每条七、八元，养到十

八公分左右，每条可卖几百元；如果养到二百五十公分以上，少说也可以卖得几千元。干其他的活儿哪有这么好赚？还是改养金龙鱼好了！

于是，太多人忙着捕捉金龙鱼、饲养金龙鱼，买卖金龙鱼，总希望金龙鱼会带来奇迹。

8.10.1988 星洲日报星云

夹起一片故乡情

——话说筷子

我们的祖先发现，以空手执热山芋或取烤肉都很烫手，改用两支树枝夹持它们，就利落得多了；这一夹竟成了一双筷子，沿用至今。

生理学家对使用筷子的事儿也有高见。他说，使用筷子时，是在神经系统的支配之下，牵动了手指、手掌、手臂、肩胛等三十多个关节和五十多块肌肉。如果一日三餐，各用半小时的筷子来进餐的话，那么一天便是练了一个半小时的筷子功了。久练可使心灵手巧，对你有益。

筷子必须成双使用，才能坐收杠杆的力道。这科学道理浅显易懂，要是再申论其意义可就大了。单支筷子则独木难支，发挥不了作用；一双筷子则好事成双，代表同甘共苦的一对。有一对艺人取名为筷子姐妹，用意很好；不过一旦姐妹拆伙，便不成为筷子了。

我敬佩靠自己劳力吃饭的人。你瞧他们一身泥黑，满脸汗水，光明正大的用筷子扒饭吃。你听其中一位用筷子指着

碗中的饭说：“咱们吃的是硬饭，有志气！”

我想我们的祖先播迁世界各地，不都是靠吃硬饭起家的吗？人们推崇日本人以武士道的精神振兴国运，韩国人凭苦干精神兴家立业，而中华民族则以刻苦耐劳的传统精神打天下。我们要发扬的正是这一类的优良传统。中华民族在吃硬饭的时候，都没忘记使用筷子。

华族平日家居，都爱用筷子，一家人齐齐用餐时，要是发现少了一个成员，无论长幼都会停箸暂借问：

“阿爸吃饭未？”

“阿吉仔吃饱未？”

等到一家人都坐齐了，才共尝米饭之香，吃出天伦之乐的滋味来了。

单身出外的人，在异地受到同胞簇拥时，浓浓的乡情温暖了人心。再见桌子上已摆好一双双的筷子，使人感到宾至如归，游子早把乡愁夹掉了。

近百年来，筷子不为“全盘西化”的运动所化解，也不受“横的移植”动力所取代，筷子的定力之大，真叫人惊叹。

在近代史中，中华民族屡次遭受内乱外患的创伤，自尊与自信也饱受摧残。有些人就趁机为传统文化抹黑，数落它的不是。激进者取道西方求经，多年后上岸，才惊觉自己又

回到东方来了。他们才发现，原来的根是扎在这块土地上的。

他们也发现世界各民族都有自己的传统，它凝聚个体成为民族的整体。没有传统文化的民族就不会壮大起来，也经不起冲击的力量。科技再进步，如果没有人文的依附，人类就成为没有血肉之躯而沦为机器人。

我们得珍惜筷子，请读读郭永秀的《筷子》这首诗：

五指微挑，轻轻
夹起五千年的芬芳
精致，如慢磨细琢的象牙雕刻
轻灵，如伸缩自如的关节
简单而实用，
是手中两支等长的平衡
那时候，我们的祖先
从长江黄河翻滚的急流中
湍湍涌出
涌向无人的海岸
向南，向陌生异域

不毛的荒岛
以两支竹筏
徐徐插下，一则
拓荒的血泪史

一支擎着，辛勤与智慧
一支擎着，和平与友爱
两支，便擎起
整个民族的历史与文化
底下，根须开始蔓延
且慢慢深入
岛上每一寸土

多少辛劳，多少努力
一代又一代
生命延续，以两支竹筏
祖先在历史中告诉我们：
一支易折，两支
才有御敌的力量
合起来便可——

顶天立地威武不惧
不能分，一分
根须腐烂，枝桠断裂
子孙也找不到族谱

如今，当我们丰衣足食
爱好时髦的下一代，
争着拿刀叉的时候
谁去告诉他们：
这平凡而真实的——
筷子的故事？

9.1.1989 星洲日报星云

兰屿萍踪

北方有一百零四个小岛，成群鬼游在瓜拉玻璃市以西的二十七公里处，这些群岛取名为兰屿(Pulau Langkawi)。

五二六平方公里的兰屿，有三万多人孵在上面，古朴恬静也成了形。

自古以来，山灵与岛屿都有很多传说。缥缈的蓬莱远在东海中，却有青鸟殷勤为探看；兰屿或许就像蓬莱吧，引得游人看多时。

史学家说的，兰屿是古国狼牙修国土的一部分。公元三世纪时狼牙修在中南半岛称强，虽然那时它仍然是扶南国的藩属。岛上的拉雅高山，疑是明朝航海家费信诗句中的“遥望兹山势，龙牙犀角峰”。

一九八九年我们慕名去探看兰屿，却被渡轮拒绝摆渡，要挨到入晚才上岸。那时华灯初上，一支支古朴典雅的灯柱，已为游人提灯，连成一条弧线，往左画向瓜镇(kuah)去。当晚，我们留宿瓜镇一宿。瓜镇只有几条街道，朴实无华，却是兰屿的重镇。镇上的商店，以售卖泰国、印尼和国货比较多，烟酒和电器也不少。这里是自由港，货物免税，因而吸引无数游客来这里购物。

瓜镇面对着海，海滩上长着木麻黄树，针叶拨开云朵见到一弯新月，燃亮着点点的星光，闪烁着点点的渔火。这时

我忽然想起一句唐诗：“潮落夜江斜月里，两三星火是瓜州”，也许这时两地的景色有几分相像吧！其实兰屿的岛外有岛，水为它们交流着情谊。或者是微风吹皱的海水，都给一艘艘的渔船熨平了，不然为什么没有波浪的声响呢？

第二天早上，我们乘车环岛走一圈。一个个故事又在我耳边响起，一个个实景就摆在我眼前。经过中央政府和旅游局的策划和发展之下，兰屿处处可见美化和建筑的工事。

车子穿过橡胶园和椰子园，只见林荫深处有人家。一径径的阡陌，一方方的田畦，为大地打格子，把山峦推得更远，拉得更高。一路上，我们掇拾村落的宁静，田园的青翠。

拿督奥沙玛沙滩，还有杜黛和丹绒露沙滩，沙细水清，林荫下的旅舍，不论是踏沙行或是弄潮汐，都是相宜的乐事。到热水井边来，我们可以一探人间的冷暖；黑沙滩像给撒上锰粉一样，全马只此一处，令人啧啧称奇。

看到玛苏莉陵，才算看到名胜的重点；兰屿的许多脍炙人口的传说中，要数她的为最。

玛苏莉陵只是一个方形的大理石陵墓，四周有围墙护着它，也加以美化。附近有和饮室，可以供游客休憩。

传说是这样的：话说二百多年前，岛上的殷商有个女儿玛苏莉，她长得秀慧端庄，当时的村长克马再也(Datuk Seri

Kerma Jaya)垂涎她的美色，想纳她为妾，但受到其妻玛胡拉(Mahura)的反对而作罢。后来玛苏莉就嫁给村长的儿子麦德礼士(Mat Deris)，两口子倒也生活得很幸福。不久麦德礼士到暹罗做生意去，那时玛苏莉也怀孕了，便回娘家养胎，和父母亲住在一起。

有一天，岛上来了一行吟诗人特拉曼(Deramang)，他也善长讲古。玛苏莉赏识他的才华，要求父母收留他。玛苏莉产下宁馨儿之后，村民常常来探望她，特拉曼就为到访的客人唱诗讲古，作为娱乐。

可是小心眼的村长夫人玛胡拉就向村长诬告，说玛苏莉和特拉曼有了不轨的行为，虽然玛苏莉一再申冤，可是村长还是刺杀了她。玛苏莉死时喷出白色的血液，这表示她的灵魂是圣洁的。她在临死前也发毒咒，说兰屿此后将没有安宁的日子可过，七代人都会受到折磨。

果然过后，暹罗挥军攻打兰屿，村长克马再也囤积米粮备战。在双方作战时，暹罗军队放火烧村，村长一家人都被杀害了，村民也被掳去暹罗当奴隶。

战后的兰屿满目疮痍，村民饥寒交迫。有人就到囤米仓挖米去，可是稻米都变成烧焦的黑米，这就是“黑米仓”(Beras Terbakar)的由来了。此后，兰屿经常遭逢天灾人祸，成为荒

凉的岛屿。人们说，玛苏莉的咒语果然应验，这当然是附会的说法。如今七代人已经过去了，科技的步伐也踏到兰屿，在政府的发展下，飞机场和高级旅店都建筑起来了，各种设施也不断地在增添着，再过多几年，兰屿一定会繁荣起来。一九八九年的英联邦首长会议，就在兰屿举行，有这么多的显要来看兰屿，够风光了吧！

至于其他的名胜地，像白鳄鱼潭、仙人洞、孕妇岛，由于行脚匆忙，也就无缘一游。

中午时分，我们离开兰屿，回到瓜拉玻璃市码头来了。

7.1.1991 星洲日报星云



文可以载道，文也可以不载道，但必须有美。凡真的都很美，凡美的都很真；情到真时物亦有情，那是真情流露，文学的感染力就产生出来了。

文学的探索

①

我们常常听见前辈作家说：文艺作品必须要有形象思维。用形象思维所写出来的景物，才是鲜明的，它好像站立在你的眼前似的。

我们也常常听见导师说，文章要写得生动，这样才能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

这些话都没错。如果把这两句话合起来讲，那就是文艺创作必须要写得具体生动。

廿世纪的著名诗人艾略特也这样说过：“表达情意的唯一艺术法则，就是找出意象，那就是一组物象，一个情境，一连串事件，这些都是表达该特别情意的公式。如此一来，这些诉诸感观经验的外在事项出现时，那特别情意就马上给唤引出来。”艾略特的说法，也很有道理。意象是什么？简单地说来，意象就是通过文字组织而构成的图象。意象会随读者的联想而变得繁富起来。

试读一读舒兰的儿童诗《虫和鸟》：

我把妈妈洗好的袜子，
一只一只夹在绳子上，
绳子就变成一只多足虫，

在阳光下爬来爬去。

我把姐姐洗好的小手帕，
一条一条夹在绳子上，
绳子就变成一群白鹭鹭，
在微风中飞舞飞舞。

作者把晾袜子和晒手帕的景物写得具体生动。出现在读者脑海中的意象是一只多足虫在爬动，一群白鹭鹭在飞舞，这不但充满美感，而且充满情趣。——文学要有美，要有趣味。

②

好的诗文，除了要有充实的内容之外，其他的重要因素包括：语言的魅力、形象的站立和构思巧妙。它们以整体的和谐组合而达到艺术水平。

语言的魅力来自动词和名词，成为文句的“骨节眼”。由于名词是具象的，有显像的效果；动词则有动态，充满活力，因此名词配合动词，不但能够站立形象，而且使物像有生命、有活动。这并不是说其他的词类像副词、形容词和连

词等都不重要了，而是说其他的词类则是处在辅助作用的地位。

我们可以这么说，如果文学作品中，没有形象的站立，艺术就难以构架起来。艺术是把生活中的真实部分加以概括和集中，再突出作者所要表达的事情和思想意识。生活的真实并不等于艺术的真实，因为来自生活的素材必须经过提炼浓缩才能成为艺术品。这个情形就像蜜蜂采蜜，必须经过酿制才能成为蜜糖的道理一样。

文学家都有这个本事，他们把抽象的事物，写成具体的；把平面的东西写成立体的，变得可闻（嗅觉）、可见（视觉）、可听（听觉）、可感（触觉）。他们把要描述的对象，摆在读者的眼前，使读者有所感受。马华作家黄应良有一首小诗是这样写的：

月夜里，
月光在窗外徘徊，
我才把灯熄灭，
它们便潮水似的涌进来。

作者把月亮拟人化了，说它在窗外“徘徊”，在熄灯之

後，月光便“涌”进来。月亮、月光、潮水都是实词，也是具象的。作者又用“徘徊”和“涌进”代替动词“照耀”和“照进”，就显得更有律动感，也鲜活得多了。我们好像看到月光在徘徊，随着灯光的熄灭而涌进屋内。这首小诗的语言魅力来自“潮水”、“徘徊”和“涌进”，而诗眼则在“涌”字。

清朝的龚自珍，也有一首好诗，读来令人击节赞赏，和黄应良的小诗写法有异曲同工之妙。龚诗如下：

黄金华发两飘萧，
六九童心尚未消。
叱起海红帘底月，
四厢花影怒于潮。

作者把狂风掀起窗帘而见到明月，和花影如狂潮排倒的情景，写得如此鲜活，意象从“帘底月”、“花影”到“怒潮”，可谓纷繁呈现，充满艺术的美和感染力。诗中动词“怒”的力量，推拥起“潮”的形象，而且演出扣人心弦。这不得不佩服作者构思的奇妙了。

从上述的诗歌例子当中，我们发现比喻具有造型的功能。

实际上，比喻也是重要的技巧，应用得好，就收到具体生动和站立形象的效果。比喻是用一种事物来比拟我们所要描写、叙述或说明的事物，使它更为清楚、美好，因此比喻的用处很大。

白居易的名诗《琵琶行》，就采用大量的比喻来描绘歌女弹琵琶的情景，读来引人入胜。现在姑且摘录部分诗句为例，方便我们参照：

千呼万唤始出来，犹抱琵琶半遮面。
转轴拨弦三两声，未成曲调先有情。
弦弦掩抑声声思，似诉平生不得志。
低眉信手续续弹，说尽心中无限事。
轻拢慢捻抹复挑，初为《霓裳》后《六么》。
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语。
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
间关莺语花底滑，幽咽泉流水下滩。
水泉冷涩弦凝绝，凝绝不通声暂歇。
别有幽愁暗恨生，此时无声胜有声。
银瓶乍破水浆迸，铁骑突出刀枪鸣。
曲终收拨当心画，四弦一声如裂帛。

东船西舫悄无言，唯见江心秋月白。

琵琶女在“千呼万唤始出来，犹抱琵琶半遮面”之下出场，其形象十分鲜明。这表示歌女对卖唱生涯的厌倦，和内心哀怨的表露。白居易除了借助摹声词之外，更应用了大量的比喻来形容音乐之声。作者用了“急如雨”，“珠玉落盘”，“莺语花底滑”，“泉流水下滩”，“银瓶乍破”，“铁骑突出”，“弦声裂帛”都是比喻。歌女弹琴情景再现了，音乐之声也不绝于耳了！

③

利用对比，也有助于突出形象。在文学作品中，对比是经常用到的手法和技巧。对比是用两种相反的事物摆在一起，作对照的形容，给人尖锐的感受。中国现代派诗人卞之琳的《断章》就采用对比的手法来写：

我站在桥上看风景
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

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

你装饰了别人的梦

卞之琳用对比来铺陈景物，他在推衍景物之外，又加上本身的对立，使物象很有层次地罗列开来，产生立体感。

唐朝诗人刘禹锡的《乌衣巷》，成功地以对比的手法来表达乌衣巷今与昔的人世沧桑。

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

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乌衣巷是东晋时代王导和谢安两大豪门望族的聚居之地。朱雀桥横跨秦淮河，是由金陵城通往乌衣巷的必经津梁。因此，我们可以想像得到乌衣巷和朱雀桥上繁华喧闹和车水马龙的情景。可是现在呢？朱雀桥边春来野草丛生，野花绽放其间，荒凉代替过去的繁华。乌衣巷的夕阳斜了，只见一抹残照披在没落的街坊上，以往如日东升的气象已经消失了，盛和衰如形影相随，对比强烈。

经过诗人用意笔勾勒出朱雀桥和乌衣巷的衰败图绘之后，他又用工笔去细描“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的一瞬间形象，贯穿古今，令人兴叹今与昔之云泥差别。这又

是多么强烈的对比啊！这禹锡刻意在燕子飞掠之后，留下空白，让读者在那里驰骋其想像。这种空白之美，意在言外，正是作者的高明之处。

意笔和工笔的交错应用，也可以使作品有不同的效果。换言之，作者在写作时有的地方不必写得太详细，有的地方却要写得细腻。譬如画家画竹，几笔的勾勒，就画出竹的形象来了，同时意到笔随，画出了竹的气节，象征君子的泱泱风度。画家又用细笔去描绘竹节和叶脉的部份，甚至再画上一只鸟，其羽毛纤毫毕露，脚趾抓紧竹枝，神态怡然自得。画上也留下空白之处，那里正有无言的美。

④

文学靠形象的站立，语言的魅力和构思的巧妙而成其篇章。

文学应该有文学的趣味，使作品得到滋润，不会令读者读起来感到干巴巴的。

文学也有其思想性作为支撑，使读者有所感悟。

散文家梁实秋的作品《聋》就写得充满文学的趣味。

近来和朋友们晤谈，觉得有几位说话的声音越

来越小，好像是随时要和我谈论什么机密大事，喝喝啲啲，生怕隔墙有耳。我不喜欢听扯着公鸡嗓、破锣嗓、哗啦啦哗啦叫的人说话，他们使我紧张。
.....

耳聋当然有不便之处。独坐斋中，有人按铃，我听不见，用拳撞门，我还是听不见，急得那人翻墙跳了进来。我道歉一番耸耸肩作鸢鸢笑。有时候和人晤言一室之内，你道东来我道西，驴唇不对马嘴，所答非所问，持续很久，才弄清话题，幽默者莞尔而笑，性急者就要顿足太息，我也觉得窘。闹市中穿道路，需要眼观四路耳听八方，要提防市虎和呼啸而来的骑摩托的拼命三郎，耳不聪目不明的人都容易吃亏，好在我早已为自己画地为牢，某一条路以西，某一条路以北，那一带我视为禁区。

作者以平凡的题材，作形象化的描述。把耳聋这回事，娓娓道来，充满意趣，理趣和情趣。

最後我要用我的一篇散文《林间人家》里头的一段文字作为例子：

我们来到一个园地里，这里杂草丛生，其间也

长着灌木，长着芋头仔。芋叶像突露水面的荷叶，它招风摇曳。风里散发着泥土的气息、野花的香气。草丛间还有星星点点的花朵，招引蜂蝶。你可以在灌木上，发现一株攀缘植物爬上来了，在顶上开着几朵向阳的花。花朵里斟满醉人的阳光，流溢出来的阳光，洒在叶子上，亮绿亮绿的。生命的延续，就是在环境中求生存，各自扎根，互相扶持，融洽融洽的相处在一起。它有生的喜悦，充满希望，就像这一片田园的绿意和生机。

文中除了有形象的描写外，还有思想性作为支持。

总之，文学从生活出发，通过技巧和文采来表情达意。作者把生活的素材提炼后，使它具有概括、集中和强烈的特性；又用形象的站立，和语文的魅力构成篇章。其卓妙的比喻，强烈的对比及文字的魅力可加强感染力。而这一切都必须经过巧妙的构思。

8.5.1986 南洋商报南洋文艺

注：本文是作者应新山宽柔中学华文学会的邀请，於12-4-1986在该校举办的文艺与新闻实践营内发表演讲的讲稿。

关于写新闻诗

今年八月中旬，马潮联在哥打峇鲁举行马华文学展及文艺讲座会。陈思庆在主讲《欣赏诗、诗写作》的专题讲座中说，新闻诗是值得我国写作人尝试的文学样式。

他认为新闻诗除了可以开拓写诗的题材之外，还可以吸引读者，甚至可以打破诗与读者之间的距离与隔阂。因为，新闻诗的内容是近乎家喻户晓的真实事情，在理解上也不会有太多的障碍。因此写新闻诗，是推展诗的大众化与生活化的捷径。陈思庆的这些话，是应该受到重视的。

诗原是文学体裁中一个多面的结晶体。诗的可以“兴、观、群、怨”，正阐明诗具有多种使命。以新闻为题材入诗，可以展现诗的另一个层面。“诗言志”原是它的本质，但诗载道也是诗所能负荷的重量。许多重量级的诗人，诗作博大，言志与载道兼容并蓄，如杜甫和荷马的诗即是。社会意识是文学的重要品质之一；置之于诗歌，也是如此。因为诗的实质是人生，不论诗人写的是人生的共相或殊相、点或面，都是取材于社群中的人事，所不同的只是社会意识的强弱而已。诗的形式是艺术的表现手法。诗人融情入景，契合事物的神貌，创造文字的意象，激发读者的想像，使意象更为繁复，诗味更浓。

台湾诗人非马，在诗坛上是“一匹昂首扬蹄，纵横飞驰

的矫健的黑马”。他是核工博士，所写的诗作深入浅出，大多富有社会意识。以下选录他的诗作《越战纪念碑》为例：

一截大理石墙
二十六个字母
便把这么多年轻的名字
嵌入历史

万人冢中
一个踽踽独行的老姬
终于找到了
他的爱子
此刻她正紧闭双眼
用颤悠悠的手指
沿着他冰冷的额头
找那致命的伤口

非马用来表达慈母丧子的悲伤的艺术手法，只写她到纪念碑前凭吊时，抚着碑上儿子的名字，颓然欲绝，不能自持。——非马用“此刻她正紧闭双眼/用颤悠悠的手指/沿着他

冰冷的额头/找那致命的伤口”。诗人以写实主义融合现代文学的成份来表达，这使到非马的诗不但意象鲜明，而且可颂易懂。又因为诗句的象征性强，层次多重，就十分耐读了。

在台湾，新闻诗的写作开始于七十年代末期，迈入八十年代之后，它就蓬勃地发展起来，至今已有一定的成绩。新闻诗大量地出现于痖弦主编的联合报副刊。台湾诗人在经历了保钓运动、乡土文学论争、台美断交、美丽岛事件之后，感知于家国乡土和优秀传统文化的珍贵，以及人生现实的关切，他们觉得必须积极地发出诗的声音。加上台湾政治体制的运作有了因应的调整，留有较为宽容的地步。诗人依据这道投射而来的阳光，立即投入社群的生活广场去。他们对国家大事和社会新闻，作了适时的反映，借以激励民心；新闻诗成了强而有力的反映人生现实的体裁之一。痖弦在他的《中国新诗研究》（1981年出版）的《现代诗的省思》的篇章中说：

文学风尚恰似钟摆摇动，或则写实；写实的可成就其为博大，写意的亦不妨成其为纯粹；不管这钟摆如何摇动，真正的诗人不能尾随流行，而应本着良知写作，发挥文学自由的特性与创作文学的大用。虽然，我们掩卷三思，仍然承认，对于一个苦

难的民族，我们期待博大诗人的产生，似乎要比期待纯粹诗人来得迫切。

痙弦的这番话，大约可以反映台湾当前一般诗人的诗心归向。

走笔到这里，再以非马这位研究尖端科学的作家的新闻诗为例，借以管窥台湾新闻诗的一斑：

巧遇？

——哀韩航零零七

冰雪的空中

两百六十九个

热切想家的

心

恰好是

冷血的

飞弹

苦苦追寻的

对象

全诗只是短短的三十二个字，写出苏联飞弹击毁南韩民航机的事件。飞弹苦苦追寻地民航机之后，便是命中目标和呈现爆炸的火光，直到血肉纷飞而殒落为止。诗人只写到“恰好是/冷血的/飞弹/苦苦追寻的/对象”时，便戛然而止，其他的后事就留给读者用思想去处理，这正是诗人的艺术高招。

我认为写新闻诗，一定要有艺术性。缺乏艺术成份的新闻诗，就没有文学价值。杜诗之所以留传千古，除了诗作具备时代感和历史感之外，更重要的是它们都具有高超的艺术水平。

一九八五年，我也尝试写新闻诗。

我在报上读到非洲亢旱的一些新闻。原来三年的亢旱，非洲的灾区遍盖二十二国，超过两亿五千万人受尽饥馑的折磨，路有饿死骨。撒哈拉沙漠也因为亢旱而扩大其地域，咄咄逼人。

列国中尤以埃塞俄比亚的灾情最为严重，该国的十四省中，有十一省成为灾区，饿殍已达数百万，每日就饿死几百名儿童。该国又因内战频仍，举措不当，交通窄颈难行，大大地妨碍了联合国救济品的供应行动。

可是在饥贫交迫之下，埃国政府为庆祝建国十周年紀念，就向外国购买五十万瓶威士忌酒，热烈庆祝一番。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报上刊出埃国儿童的乞食图：他坐在母亲席卧的帐篷外，无力地把头垂覆在膝盖上，无声地等待救济。

读了一系列非洲闹旱灾的新闻报道之后，我的心里就有一些感触，也就有了创作的冲动，便写了以《饿》为题的新闻诗。这首习作后来给刊登在南洋商报的《文星》文学周刊和台湾联合报副刊上，稍后为《亚洲华文作家杂志》所转载。我试把它抄录于后，作为我转换新闻为诗的诗想轨迹：

撒哈拉驰骋挥下鞭影
非洲二十二国焦在风火轮下
龟裂的土地 乾瘪的河床
没有清流哪有倒影

响马掠夺后
风沙依旧夕阳红
饿殍扶道而来
两亿五千万的儿女

行乞于海市蜃楼
傍着堆积如山的土产
纷纷饿倒

母亲已经没有乳汁可挤
她只托一钵 着一钵
向联合国救济站化缘去
一杯羹也只能供母亲卧地残喘
另一杯羹要孩子等在帐篷外
用空罐
储满风沙呜呜的回响

孩子的小脑袋
斜支在膝盖上
祖国埃塞俄比亚的
半壁江山
也倾斜在他的膝盖上

五十万瓶威士忌酒 爆响
五十万声

“建国胜利”的欢呼
军政要人齐齐掐死
窄颈瓶
在建国十周年庆祝会上
纷纷醉倒

我也希望借着新闻事义的激引，使诗人及时用艺术的笔触挥写成新闻诗。诗人一旦有了更广阔的景观，在审视“月涌大江流”风物之际，也同时体会到“万古诗心一江流”的道理。或许，新闻诗也能够为马华文学两岸的景观，增添风华哩！

9.10.1987 南洋商报南洋文艺

那挥动的左右手

一九八九年一月廿六日下午，余光中教授到马六甲培风中学演讲，我赶去听了。

演讲会由南马文艺研究会、马六甲留台同学会、马六甲南大校友会联办，培风中学协办，请年红主持。

余教授此行的另一个目的是探幽访胜，同时看看他父亲生活过的地方。原来余教授的父亲余超英曾于二十年代到马六甲益智学校执教，一九二三年正月至一九二四年五月出任育民小学校长之职。余老先生健在，现年九十三。当天早上余教授到访时与数位高龄的堂亲余金鉴局绅、余金山校长以及我的岳丈、前育民小学校长余其昌等一行人叙旧和走访古迹。

第一次看见余教授，觉得他是瘦小的文坛巨人，稀疏的头发早为缪思而白，更令人肃然起敬。

余教授统领三十年来台湾文坛的风骚，影响了当代华文世界作家，近期被大陆文艺界誉为“浴火的凤凰”。

余教授自称以左手写散文，用右手写诗，挥洒自如。

早期，我认为余教授的散文比诗写得好，他的第一、二本散文集《左手的缪思》和《逍遥游》比诗集《舟子的悲歌》和《钟乳石》好看得多了。而现在我认为他的散文和诗都很杰出。

余教授生于一九二九年，今年六十岁，祖籍福建永春。远在五十年代，他的作品深受浪漫主义和廿世纪现代主义文学的影响，倾向西化。六十年代中期之后，作品逐渐转向中国古典的传统，饱含民族的色彩，也融入写实的笔触。因此，他后期的作品都明朗可颂，隽永有味，在在掷地有声。

批评家夏志菁教授说，余光中教授将中国古文的节奏与色彩，配合思想的深度、结构多采多姿的现代白话文体，铸成优美的诗文，尤其是他不少忆述往事的抒情文章，更见缤纷华丽、音节铿锵，巧妙地随着感受与情景而转变，又多着意嵌入古典佳句，不愧为惊人之笔。

早在一九七九年的香港文学周文艺讲座会上，余教授就说过，中国六十年来的新诗，分别受象征主义、新古典主义和现代主义所影响。其中像李金发、戴望舒等的象征派和纪弦、洛夫等的现代主义派，都源自西洋的现代主义主学，是“横的移植”。而从何其芳、卞之琳以至于辛笛、郑愁予等所一脉相传的新古典主义派，则源自中国古典传统，是“纵的继承”。余教授认为“纵的继承”更为重要。至于要建立中国现代文学，他认为除继承传统文学外，还必须汇入西方二十世纪现代主义文学的优秀部分。余教授在演讲会上说：“当今两岸作家的交流，应该尽早建立文学的共识，共同建设现

代中国文学，这比政治上的统一还要重要。”

在演讲会上，余教授称赞中文是优秀的语文，它行文简洁，声韵和节奏都很优美。白话文继承了文言文，为的是使中文更为普遍地为人们所应用。因此文言文无罪，它的简洁行文、明快的节奏和丰富的语汇等优点，都可以做白话文的营养补给。可是，现代的白话文却受到西化和方言的坏影响，使它变得繁琐，离纯正的中文越来越远，成为隐忧。比如说“这本书很好看”给写成“这本书的可读性很高”。“他的歌声十分悦耳”给写成“他唱的歌，可听性很高。”，“王维的诗富有中国诗的韵味”给写成“王维的诗很中国化”，诸如此类都是西化带来的恶果，弊多于利。揆其原因，大多是受了报章杂志的不良翻译的影响，或是作者以英语语法和构词法硬套进中文里的后果。但西而化之的好效果，就值得效法了。余教授以徐志摩的《偶然》一诗为例：

我是天空里的一片云，
偶尔投影在你的波心——
你不必讶异，
更无须欢喜——
在转瞬间消灭了踪影。

你我相逢在黑夜的海上，
你有你的，我有我的，方向；
你记得也好，
最好你忘掉，
在这交会时互放的光亮！

余教授说，后半节的诗句，就是西而化之的佳句，如果照中文的写法，应该是这样的：“你我相逢在黑夜的海上/你有你的方向/我有我的方向/在这交会时互放的光亮/你记得也好，最好你忘掉它”。如果是这样写的话，诗味就减少了。

中英的语法各有不同，比如说中文可以略去主语，意思仍然是完整的、正确的。贾岛的《寻隐者不遇》就是一个例子：

松下问童子，言师采药去。
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

全诗的每一句都没有主语，但很明显地是作者贾岛问童子，童子回答说他的师父到深山去采药了，就不知道现在他在深山里的那一个地方。如果照英文的语法在每句诗中都加上主语成为七言绝句的话，它就变得繁琐无味了。

中文是单音字，不是平声就是仄声；诗更讲究声韵之美。“红男绿女”的声韵是平平仄仄，念起来很顺口。五、七言诗能够盛行不衰，主要的是声韵有变，平仄相间，错落有致，很好念，听来又悦耳，如果少了一个字，又怎样了呢？余教授把贺之章的《回乡偶书》的各句删去一字，变成六言绝句，念起来是这样的——

少小离家老回，
乡音无改鬓衰。
儿童相见不识，
笑问客从何来？

诗中各句依次删去的字是“大”、“毛”、“相”和“处”，诗句意义也没改变，可是诗味全失，成为散文了。

诗句的分行得看语气、语意和节奏而定，胡乱地分行，不但念起来有吞吞吐吐的感觉，还造成支离破碎的现象。太

长的诗句，朗起来又上气接不了下气，节奏一定不好。余教授又说，写诗固然是自由的创作，但是仍然有规律可寻。譬如打球，你必须为自己所喜欢玩的球戏定下规则，除了供自己游玩之外，也给别人遵循，否则球戏就完不下去了。同样地写诗也是基于常态和规律而进行的，这样才有诗味和风格，才能和别人沟通。

余教授朗诵了他喜爱的两首诗结束演讲会。通过这两首诗，可以印证他的诗论和诗观。第一首是新作“雨声在说些什么？”全诗有如童话诗一般，真纯感人。第二首是他后期的诗作“踢踢踏”，怀念儿时拖着木屐行走的乐趣。“踢踢踏”曾由作曲家谱曲，还得到金鼎奖的歌词奖。全诗如下：

踢踢踏

踏踏踢

给我一双小木屐

让我把童年敲醒

像用笨笨的小乐器

从巷头

到巷底

踢力踏拉

踢踢踏

踏踏踢

给我一双小木屐
童年的夏天在叫我
去追赶别的小把戏

从巷头

到巷底

踢力踏拉

踏拉踢力

跺了蹬

蹬了跺

给我一双小木屐
童年的夏天真热闹
成群的木拖满地拖

从日起

到日落

跺了蹬蹬

蹬了跺跺

踢踢踏

踏踏踢

给我一双小木屐
魔幻的节奏带领我
走向童话的小天地

从巷头

到巷底

踢力踏拉

踏拉踢力

晚宴过后，余教授即赴都门，准备在第二天飞回台湾去。我和年红则驱车南下，奔向家门。途中，年红提起余教授在餐席上说过的一句话：“作家从事创作的过程中，应该是越写越淡，但是要淡得有味。”这是否是余教授总结文艺创作的一句话，就不得而知了。

而我却想起毕加索行年九十时，对自己艺术进程作了一个总结：“我十二岁时，已经能画出像拉斐尔那样的画了。可是学了一辈子，才能画得像小孩子的一样。”

2.3.1989 南洋商报南洋文艺

泛游在散文的长河上

散文的功能和创作

有的作家说，他宁愿写一篇两千字的小说，就不愿意写一篇五百字的散文。原来散文易写难工，打一个比喻，写好散文像打真功夫，硬桥硬马。

散文离不开生活，但生活并不是散文。散文好比老友记向你滔滔不绝地诉说什么的；但会滔滔不绝地说话的人，未必就会写好散文。散文只是人生的小切片，大天地中的小场景，要达到文学的水平，它必须比普通生活的要求更高、更典型，它需要浓缩、集中、概括和凝炼来表意、说理、叙事、写景、状物和抒情。过去散文以抒情为正宗，即使是说理和议论也是用来摆渡作者的感情之用。随着时日的迁移，散文的流域逐渐扩展，以论说为主的杂文，也统归在散文的范畴之内。

实际上抒情散文，并非单纯地抒情，我们不能抽刀断水，把状物、写景、表意、说理等成份割切出来。谈到这里我们先来欣赏一段散文佳作：

钟表上的时针是在慢慢地移动着的，移动得如此之慢，使你几乎不感觉到它的移动。人的年纪也

是这样的，一年又一年，总有一天会蓦然一惊，已经到了中年，到这时候大概有两件事使你不能不注意，讣闻不断的来，有些性急的朋友已经先走一步，很煞风景，同时又会忽然觉得一大批一大批的青年小伙子在眼前出现，从前也不知是在什么地方藏着的，如今一齐在你眼前摇曳，磕头碰脑的尽是一些昂然阔步满面春风的角色，都像是要吃喜酒的样子。自己的伙伴一个个的都入赘了，把世界交给了青年人。所谓“耳畔频闻故人死，眼前但见少年多”，正是一般人中年的写照。……

四十开始生活，不算晚，问题在“生活”二字如何诠释。如果年届不惑，再学习溜冰踢毽子放风筝，“偷闲学少年”，那自然有如秋行春令，有点勉强。半老徐娘，留着“刘海”，躲在茅房里穿高跟鞋当做踮高跷般的练习走路，那也是惨事。中年的妙趣，在于相当地认识人生，认识自己，从而作自己所能作的事，享受自己所能享受的生活。科班的童伶宜于唱全本的大武戏，中年的演员才能担得起大出的轴子戏，只因他到中年才能真懂得戏的内容。

(梁实秋：《中年》)

《中年》是以表意为主体的散文。作者把抒情和说理的成份揉和在一起，表露出生活中的意趣、理趣和情趣。作者写哀乐中年的情怀，但态度仍然是积极的。写表意散文，作者必须洞察人情世故，才有练达的文章。

文可以载道，文也可以不载道，但必须有美。凡真的都很美，凡美的都很真；情到真时物亦有情，那是真情流露，文学的感染力就产生出来了。

高尚的思想和情操有美，它像一条线把文字的珠玑串连起来，使它集中。而字粒与字粒的碰击，就出弹出音韵的美、节奏的美、诗意的美，这就是古人所说的“事出沉思，义归乎瀚藻”的话。让我引录法国安德烈·纪德《地粮》文中的一段状物文字：

一窗阳光之前，葡萄全悬挂在细绳上，每一粒都在沉思、在成熟，暗暗地咀嚼着阳光，酿制芬芳的糖分。

作者把静态的植物写得很有生命的律动感，也透视出果

实成熟时的变化情况。这和陶渊明的“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的深入物象一样，用现代的话来说就是“投入”。

散文以情感人，以理服人，因此，作者必须吸收科学知识，以科学的证据支持论点。作者也必须关心政治和社会变化，所谓文章为合时宜而写，才有生活气息，时代背景，使散文在人间烟火处燃烧起来，发出热和光。由观察人生，体验人生，美化人生，进而创造人生，这是文学创作上的最高境界。

散文源远流长

(1) 古代散文

从以文字记事，那是实用散文的开始。战国时代，学术上百家争鸣，诸子百家的哲理散文已很可观。汉朝司马迁的历史散文奠下基业。魏晋南北朝时，王羲之和陶渊明已写出美文。唐宋是散文的全盛时代，唐朝的韩愈和柳宗元，宋朝的三苏、欧阳修、曾巩都是散文大家。明清的桐城派、湖阳派都敬奉唐宋古文为体；归有光、王慎之、方苞、刘大魁、

曾国藩、薛福成都是有成就的散文家。

古代散文，道统思想特别浓厚，做文章不离尊君、卫道与孝亲这个范围，措词用字要求有出处，典雅华丽，使到作者的个性受到压制。

以下例举两段古文：

秦孝公据函之固，拥雍州之地，群臣固守，以窥周室。有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当是时也，商君佐之，内立法度，务耕织，修守战之具；外连衡而斗诸侯，于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

（贾谊：《过秦论》）

某以谓受命于人主，议法度而修之于朝廷，以授之于有司，不为侵官，举先王之政，以兴利除弊，不为生事；为天下理财，不为征利；辟邪说，难壬人，不为拒谏。

（王安石：《答司马谏议书》）

从表现手法来说，古代散文富有声调的抑扬变化，音节

的整齐与错综，反覆词与衬音词（虚字）的运用和自然的协韵。像《过秦论》这一段里，就用了大量的排比对偶，关联词和语气词，使文章有一种排倒而来的气势。王安石则用了四个“不为”的反覆词为每句作结，语气坚决。

(2)现代散文

五四运动之後，现代散文的最大特点是作者“个性”的介入，“性格”的表露，“风格”的展出，也就是说散文中有个自我，再以口语化来抒发思想感情，跟社群取得更大的联系，散文不再是贵族和士大夫阶级的宠物。

让我们来欣赏一段现代散文（杂文）：

吃饭还有许多社交的功用，譬如联络感情，谈生意经等等，那就是请吃饭了。社交的吃饭种类虽然复杂，性质极为简单。把饭给自己有饭吃的人吃，那是请饭；自己有饭可吃而去吃人家的饭，那是赏面子。交际的微妙，不外乎此。反过来说，给饭与自己没饭吃的人吃，那施食；自己无饭可吃而去

吃人家的饭，赏面子就一变而为丢脸。这便是慈善救济，算不上交际了。至於请饭时客人数目的多少，男女性别的配比，我们改天再谈。但是趣味洋溢的老饕年鉴(Almanach des Gourmands)里有一节妙文，不可不在此处一提。这八小本名贵稀罕的奇书，在研究吃饭之外，也曾讨论到请吃饭的问题。大意说：我们吃了人家的饭该有多少天不在背後说主人的坏话，时间的长短按照饭菜的质量而定；所以做人应当多多请客吃饭，并且吃好饭，以增进朋友的感情，减少仇敌的毁谤。这一番议论，我极诚恳地介绍给一切不愿跟人做冤家朋友，以及愿跟人做朋友的冤家。至於本人呢，愿意在诸公领导之下，努力奉行猪八戒对南山大王手下小妖说的话：“不要拉扯，待我一家家吃将来。”

(钱钟书：《吃饭》)

钱钟书是新文学运动的第一代学者作家。钱氏的文笔辛辣犀利，充满诙谐与机智。从这篇《吃饭》的一段文字里，就见到作者对生活有很深的体验。

中国二、三十年代的著名散文家中，胡适的散文清楚流

畅，鲁迅的刀笔锐利，杂文如匕首投枪；周作人的文笔冲澹闲逸，意味隽永；徐志摩的文字细腻委婉，词采绚烂，郁达夫行文委婉，感情诚挚动人；梁实秋文带幽默，是表意文字的良范；何其芳的文句绚丽柔和，林语堂语出幽默，刘半农字夹尖刻辛辣，冰心的散文以清新流丽见长。其他的散文家尚有俞平伯、郑振铎、叶绍钧、陈西滢、叶公超、刘大白、李广田、梁遇春、沈从文、丽尼、陆蠡、靳以等，都有各自的风格和成就。

抗战时期，杂文一直成为一种利器，对外则制敌于死命，对内则收发聋振聩之效。这时著名的杂文家有才气横溢的聂绀弩，以尖刻又具有说服力的讽刺性杂文来表达他对现实社会的不满。此外罗荪，何家槐也是散文老手，秦牧和唐弢也是这个时候崭露头角的散文家。与此同时，另一种散文体裁——报告文学也大量出现，田涛、臧克家、蹇艾先、王西彦、杨朔等，都写过不少报告文学。

三十年代至抗日运动期间，是中国新文学的繁盛期，散文的收获丰富。虽然说三十年的文学作品，许多地方都留有小脚放大的白话文扭曲现象，以及不良欧化的文句，但这是文学发展过程的不可避免的现象，总的来说是瑕不掩瑜。

抗日结束之后，由于中国时局的变化，文学的趋向不同，

为人所知的散文家有秦牧、杨朔、柯灵、邓拓、吴晗、廖沫沙。其中秦牧写得又快又好，以“辞藻瑰丽而命意精辟，举例精妙而譬喻贴切”为人所称道。杨朔的散文精致玲珑，很有诗意。

现代散文，经过六十多年的发展，已经很有进步。白话文也逐渐纯净，成为现代汉语。有心人应该读一读讨论现代汉语的专书。现代散文的文字很口语化，较少夹杂老鼠拉龟式的洋文或不良的欧化句子。

至於台湾方面，由于政局的改变，三十年代的文学作品，并没有受到重视。台湾的散文家不下百人，其中著名的有余光中、杨牧（叶珊）、司马中原、管管、羊令野、琦君、张秀亚、王鼎钧、张晓风、林海音、钟梅音、徐钟佩、罗青、张拓芜、季薇、钱歌川、林清玄、柏杨、李敖等等。早在四十年代，台湾文坛刚好接触到西方文学思潮的存在主义，也必然受到这种主义的冲击。当然西方的其他流派如意识流、超现实主义等文学主张和表现手法，也为一部份作家所采用，因此出现了现代派的文学作品，现代派散文也是其中的一种产品。

关于现代散文，讲究的是文章的肌理结构，包括质料、弹性和密度。我试引用杨牧和余光中的话作为诠释。

我以为现代散文的形式至少具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它承认白话文的艺术潜力。因为它肯定白话文是可靠的，它以白话文为基础，不再忤求绝对文言文所达到的那种值得艳羨又难以超越的典雅华丽。第二，它虽不忤求绝对文言文的典雅华丽，它却未能忘怀文言的好处，因此，现代散文不乏古代散文的阴影灵像，此不仅是见于表面的语言文字，亦见于肌理的章法结构。第三，它不只是文白夹杂而已，因为文白夹杂的散文巅峰，两百年前已经被曹雪芹走到了，我们再努力，也只能步他后尘而已；所以现代散文应该比曹雪芹的散文更放纵，它甚至还勇于接受欧西散文的语法和布局。至于现代散文的内容，其触及面，不容怀疑，乃是极为广大的，有时乍看仿佛它已经逸出了古典散文所能够涵盖的世界，然而进一步探讨，也未必如此。我还是认为阳光之下，绝无新事，文学的主题是有限的。你能够在表现方法上（所谓形式）突破，可是要想在主题意念上（所谓内容）发明，却是近乎不可能的。

杨牧：《中国当代散文大展》序言

所谓弹性，是指这种散文对各种文体各种语气能够兼容并包融和无间的高度适应能力。文体和语气愈变化多姿，散文的弹性愈大；弹性愈大，则发展的可能性愈大，不致于迅趋僵化。所谓“密度”，是指这种散文在一定的篇幅中（或一定字数内）满足读者对于美感要求的份量；份量愈重，当然密度愈大。所谓质料是指构成全篇散文的个别的字或词的品质。这种品质几乎在先天上就决定了一篇散文的趣味甚至境界的高低。

（见余光中著《逍遥游》页36,37）

我们试读一读下列两篇现代派散文的摘录段落：

先是有一群留着长发赤着脚的人从街的一头跳着舞着向南走来，吵杂的铜铃声，贝壳撞击声，口琴和鞞鼓声——逸向每一个张望的男女的眼神。然后我看到向日葵生长在每一个张望的男女的身体上，迅速地，抽芽开花，随着猛烈的太阳稳健地运行，我甚至看到它们三三两两地凋零，落在街道上。

一辆警车急忙地驶过，碾死已经死过的春花。

关于春花，我所能告诉自己的也只有这么多了。除了二度的死亡，这群植树的劳工还有过什么喜悦吗？我站在小溪流当中的砥石，两岸的松柏向倒影欢呼。

（杨牧：《年轮》的《柏克莱》篇）

在这段散文里，如诗的意象频密映现，令人目不暇给。“向日葵生长在每一个张望的男女的身体上，迅速地，抽芽开花，随着猛烈的太阳稳健地运行，我甚至看到它们三三两两地凋零，落在街道上。”，“除了二度的死亡，这群植树的劳工还有什么喜悦吗？”这些句子都是超现实和象征的笔法。

这世界就像哪吒一样，我们都在飞旋的轮上来去。当初发明轮子的那人，不论灵思是否得自日轮或月轮，真是一大天才。从此，人类“不胫而走”，实在是空间的一大突破。不过这重大的发明也不是一突就破的。据说最早的轮子是实心眼儿的，像只木盘，直到将近四千年前才空了心，成了老子所说的‘三十辐，共一毂’。

最早的车是否独轮车，要问考古学家，但这种元老级的交通工具，我小时却也坐过。这种车北人叫手推车，川人叫鸡公车。抗战初年，我曾和另一个小难民分坐两侧，由一个庄稼汉佝了身子推着，在机械化的日本部队之前颠摆而逃。后来到了四川又坐过一次，当然不再是为了逃难，但在蜀道难的崎岖路上，那一步三挤轧的独轮，踉跄而行，真使千山为之痉挛。当时我这小小乘客满脑子都是三国演义，不禁想入非非，幻觉是在乘木牛流马，又想“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这样坐车，也难怪要通不了。想着想着，忽然那车夫大喝一声：“小娃儿坐好！”

（余光中：《轮转天下》）

余光中在散文中试验了他的语言质料，文体和语气造成的弹性，以及浓缩与集中引导出来的美感所呈现的密度，大多都发挥出来了。文中的传统精神和民族性也都保留下来，成为他的散文特色。

香港和新马文学，都继承中国新文学的传统精神。香港处于华洋杂居的地方，受到西洋文学的影响也是不可避免的。

在六、七十年代，台湾的现代文学对香港和新马文坛都有影响。在香港的散文家当中，老一辈像徐速、力匡、徐訏、黄蒙田、司马长风、思果、吴其敏、三苏和金庸等，新一代的有黄维梁、梁锡华、张君默、彦火、黄南翔、余玉书、白洛、梁小中等位作家，都卓有成就。

(3) 马华散文的蜕变

散文是马华文坛最先出现的体裁，林穉生最早写政论，谭云山是继后出现的杂文家。曾圣提的散文清丽而富有情趣，风格婉致。新兴文学期出现的丘康（天白）、陈南、田坚（疾流），都是散文写作的佼佼者。他们的文章大多为针贬时弊和反殖民地而写。四十年代的抗战时期出现了张天白的杂文，王修慧的记叙文，郁达夫的政论，叶尼（吴天）的报告文学，王君实的记叙散文，他们都是马华文学第一个繁盛期的散文作家。

赵戎在《新马华文文学大系》散文一集的导论里说：“战后的廿年来，马华散文界，是可以分为两个阶段来说的，前一个阶段，杂文与叙述文的成绩最高，抒情文则少得可怜；

但到了后一阶段，散文界就成了抒情文世界，作品之多，蔚为奇观。”战后初期的散文家，仍旧有侨民意识，“除了叙述当地的奇风异俗外，就是讽刺一些不合理的事情，所以杂文与叙述文成了主流。”战后的马华文坛经历了紧急状态时期，反黄运动时期，散文作家都能在某一个程度上，写出社会现象，连士升、杏影、鲁白野、吴进都是这个时期的散文作家。

后继者大都是土生土长的新人，“他们以热爱土地的激情，抒发对山河风物的爱恋”，其中也包括老一辈的散文作家。苗秀、韦晕、林潮、萧村、王葛、君绍、苗芒、慧适、忧草、高秀、鲁莽、沙燕、端木虹、杰伦、冰谷、清强、温任平，伍良之、梁志庆等都是散文作家。

这里引录韦晕的《星的沉落》一文的部分写景文字为例：

这丹戎摩洛只离开实天区的十字路四、五哩。

海岸，还是像过去那样，一曳遥遥的白洁沙滩，滩头还巍巍地挺立着几株椰树，椰树背后，衬着轻松得像浮絮似的白云，但白云的边缘有些儿灰暗，这意味着时光已渐渐进入黑暗，也意味着这海滩已失落了青春。……

港湾的更深处，是一簇簇破碎支离的渔人底矮

屋子，不过，以前屋顶盖的是亚答叶，现在改用陈旧的锌片，但没有将这穷困渔村输入一种新的血液，这渔村仍旧憔悴，一脸颓唐。……

读过这段优美的散文，我们发现，韦晕描写的是祖国山河的一角，充满他对土地的爱。

结论

百川汇流的散文大河，两岸的风物都受到流水的滋润而存在。河床沉淀古典的泥沙，清流漂荡，在西风吹送之下，泛舟在散文的河流上，无限风光都在眼前啊！

31.5.1984/1.6.1984 南洋商报读者文艺

注：本文是作者于14.4.1984在新山文艺讲座会上的讲稿。该文艺讲座会由南洋商报、马来西亚写作人（华文）协会暨新山中华公会教育组联合主办。

散文的抒情、 表意和状物艺术

自从五四运动以来，现代散文创作和理论同步而行，因而造就了散文创作的业绩，建设了散文的理论体系。

早期的散文论争，大多围绕于它和现实生活的关系。随着时间的过往和沉淀，就给文评家梳理出一个理论体系来，使我们对散文的认识更为深化和全面。

假如说1935年《小品文和漫画》的结集出版，是各散文家的论争告一个段落，那么《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一二集(1913--1927)的问世，则展现了现代散文的成就。周作人在大系的散文一集的导言中，阐述了现代散文的性质和源流；郁达夫在大系之散文二集的导言里，则论述其艺术特征与作家的风格。这些都可以作为后来者的借鉴。

文学是人学，无不依附着人的感情，成为有生命的个体，随时可以再现人生。散文的不朽之处，有的是因为它的感情真挚动人，有的是因为它美得令人爱不释手，有的是因为通篇就是佳作，掩卷之后乃有余味。

抒情散文写的虽是一人之情，但也是万人之情；所表达的虽是个人的思想，但也是众人的思想，因而引起人们的共鸣。作者所写的可能只是平凡的事物，可是它所象征的和所诠释的，却是博大的情怀，深厚的感情。总之，好的抒情散文能够净化心灵，美化人生。

由于散文的范畴广大，有的散文家主张散文不必分类，统称为小品文；有的则赞成分类，以它所偏重的文体成分而定，他们的论说都能持之以理，而且见仁见智。散文的功能可分为抒情、说理、表意、叙事、写景和状物六种。其实大部分散文都兼有抒情、写景、叙事和说理的成份，有的散文甚至难以界定它是属于那一类的散文。本文为论述方便，以偏重于其类成份的散文而谈，那就是抒情散文、表意散文和状物散文。比如说以抒情为主的，就叫它为抒情散文；其余的照此类推。各类散文都各有特点，要在抒情散文里寻求战斗性就不大可能；同样的，要在写景散文里寻找一针见血的议论也很困难。但是，各类散文只要写得好，都是优秀的散文，甚至可以流传于后世。

抒情散文可分为直接抒情的和间接抒情的两大类。直接抒情的散文是作者直抒胸臆之作；间接抒情散文是作者寓事抒情，或融情入景，或情理相随的作品。

甄供有一篇抒情散文，题目叫做《手的礼赞》，给写得奔放洒脱，充满诗意。作者写各民族作家诗人在台上朗诵诗歌时连绵摆动的手势，和台下各民族作家以手的拍和动作，象征我国各民族原是一家亲，作者复叠手的意象，使人产生遐想，体会手的功能，因此他赞美手。且看甄供如何在出席

各民族作家诗歌朗诵会“百花之夜”时，以直接抒情的方法来抒发心中的感情：

手的主人，无论是在台前或幕下，来自风沙扑面的镇城或是鸟语花香的村庄下，他们大都是生活奥秘的探索者，美的追求者，捎来篮篮的百花，放出氤氲的香气。赞美，作家的手，你是人类精神文明的镗，你时代的强音的发源。……

在间接的抒情散文中寓情于事是其中之一的手法。作者通过叙事而抒情，但所叙述的事情未必完整。鲁迅的《一件小事》，冰心的《寄小读者》等作品中都是寓情于事的散文。

在借景抒情的散文作品中，实际上作者已经走进景物里去了，他的思想和感情也翩跹于景物之中。像伍良之在《北行记——浮罗交怡去来》有一小段借景抒情的文字，表现了他对乡土和生活的热爱：

流水淡，碧云飞，路茫茫，一路上说不尽的清荫绿树，群峰簇拥，湖泊点点。金山沟一两痕，瞬息即逝；林间村落，城乡市镇，风驰而过，也难以

点数。一过北海，阡陌良田，青葱稻浪，辽阔绿渺；一张张翠绿地毯，似从天边铺盖下来，好像专为欢迎宾客的光临而铺设。……

中国作家杨朔的《荔枝蜜》是借物抒情和寓理于情的散文。作者要赞颂蜜蜂，却故意用欲扬先抑的笔法来写。作者先说小时候被蜜蜂螫过，对它没好印象。后来喝了蜜糖才想到酿蜜的蜂。作者的文笔一转而到荔枝园去，他借养蜂人的口诉说蜜蜂的生活习性和特点，不禁要赞美蜜蜂。杨朔突然又把笔一转，由蜜蜂写到荔枝园外正在耕种的稻农，他们不像蜜蜂在酿蜜吗？这样，作者赞美蜜蜂也就是赞美劳动的人民，并揭示了一个人生的哲理。

杨朔在未了的三段是这样写的：

我的心不禁一颤：多么可爱的小生灵啊，对人无所求，给人的却是极好的东西。蜜蜂是在酿蜜，又是在酿造生活；不是为了自己，而是在为人类酿造最甜的生活。蜜蜂是渺小的；蜜蜂却又是多么高尚啊！

透过荔枝树林，我沉吟地望着远远的原野，那儿正有农民立在水田里，辛辛苦勤地分秧插秧。他们正用劳动建立自己的生活，实际上也是在酿蜜——为自己，为别人，也为后世子孙酿造着生活的蜜。

这黑夜，我做了个奇怪的梦，梦见自己变成一只小蜜蜂。

文学也随着时代和社会的进展而有所变异。五四运动以后，白话文已逐渐纯净优美，成为现代汉语。道统思想在民主思潮的激荡之下逐渐退隐，作家在散文中介入了自己的个性，并抒发性灵，因而出现了散文的新风貌。文学虽然不能发明，它的演变，主要是靠表现手法的推陈出新。新感性、新词汇、新体裁和新语调都可使文学变异。

此外，科技的飞速进展，使人们有新的感悟，西方文艺思潮晚来急，外国文学的语法和结构的渗入，都使现代散文变得更为繁富。它的成功，取决于融合的结果。

现代散文继承传统文学的成分，并采撷外来文学的菁华使文笔相得益彰，展现各种样式、手法、风格和流派。

近二十年来的散文作家群中，杨牧、思果、陈之藩的散

文创作成就是肯定的，他们引进现代主义文学的成分，包括超现实主义和抽象主义等的笔法，使现代散文风格为之一变。其中余光中提倡改良现代散文，自己也身体力行，以实践印证理论。

余光中提出三个重要的理论是：现代散文必须讲究弹性、密度和质料。简单地说，弹性是指文体与语调之间的因应协调，能够伸缩自如。密度是指文字的繁简得体，有助于制造情境的氛围。质料是指遣词用字有独特性，能够提高趣味和境界。

余光中以自己的陈义，进行了语文试验。在他的散文创作中，他尝试变换文句、语气和句型，使行文舒缓而又有节奏，并伸缩景物的长度和广度。他时而拉长句子，时而截短句子，使它们错落有致，也使语调的抑扬顿挫，产生良好的效果。他也用折笔，使上下句产生矛盾的意思，激起文字的波浪。他用偶句表现典丽的外貌，用排比制造排倒而来的气势。他爱用叠字或叠句以讲求声韵之美和挤迫感。

以下摘录了余光中散文《落枫城》的片段，让我们看看他的叙事和写景的手法：

作客枫城，竟然也有一个半月了。秋色如梵，

照亮了近处人家白漆的三角墙和远处的森林。日暖云轻的星期日上午，十月的尾巴晒得懒洋洋的，垂下来，成为人家廊上贪睡的花猫。小阳春的北美，尤其是伊利诺毗连爱奥华的大平原上，所谓秋老虎，并不可怕，因为它斑烂而且柔顺，更近乎一只向阳的花猫。虽说不可怕，柔驯的晌午到了傍晚，也会伸出渐利的猫爪，凌晨的霜齿，也会深深陷进乔木，将枯叶咬出斑斑的血迹。秋色之来，莫之能御。红得剖心滴血的是盐肤木，赤中带黑的，是擎天拔地的巨橡，金黄爽脆日色欲透的，则是满街的枫树了。

在另一篇散文《蒲公英的岁月》里，余光中身在美国，借景抒发他的乡愁：

开佛城，新西域的大门，寂寞的起点，万幢砌就的青绿山岳，一位五陵少年将囚在其中，三百六十五个黄昏，在一座红砖楼上，西顾落日而长吟：“一片孤城万仞山”。……於是在不胜其寒的空处他立着，一匹狼、一头鹰、一截望乡的化石。纵长

城是万里的哭墙洞庭是千顷的泪壶，他只能那样立在新大陆的玉门关上，向纽约时报的油墨去狂嗅中国古远的芬芳。

散文有另两种功能，那就是表意和状物。

表意的散文，既不是抒情，也不说理。作者要扑捉的是情与理之间的情趣、理趣和意趣。有时候，作者对事物并没有直接的批评，而是寓意于文字之中，让读者自己去思考和批判。作者以巧思妙想，配合精警和活泼的语言来挥洒。这类作家当中，梁实秋、钱钟书、林语堂及周作人都善于写表意的散文。现在试举钱钟书在《谈教训》和梁实秋在《请客》这两篇散文内的摘录文字为例：

老实说，假道学比真道学更为难能可贵。自己有了道德而来教训他人，那有什么稀奇；没有道德而也能以道德教人，这才见得本领。有学问能教书，不过见得学问；没有学问而偏能教书，好比无本钱的生意，那就是艺术了。并且真道学家提倡道德，只像店家替自己存货登广告，不免自夸之讥；惟有绝无道德的人来讲道德，方见得大公无我，乐

道人善，愈证明道德的伟大。

(钱钟书)

常听说：“若要一天不得安，请客；若要一年不得安，盖房；若要一辈子不得安，娶姨太太。”

请客只有一天不得安，为害不大，所以人人都觉得不妨偶一为之。

……泡的、洗的、剥的、切的，闹哄哄一两天，然而丑媳妇怕见公婆也不行。吉日到了，客人早已折简相邀，难道还会不肯枉驾？不，守时不是我们的传统。准时到达，岂不像是“头如穹庐咽细如针”的饿鬼？要让主人干着急，等他一催请再催请，然后徐徐命驾，姗姗来迟，这才像是大家风范。当然朋友也特别性急而提早莅临的，那也使得主人措手不及，慌成一团。客人的性格不一，有人进门就选一个比较好的座位，两脚高架案上，真是宾至如归……

(梁实秋)

状物的散文则是把物象写得逸趣横生，作者不但对该

物有深入的认识，甚至带有专业的知识。由于它带有感情的敷设，又饶富物趣，使读者读了不但获得有关该物的知识，而且还想一读再读那篇散文。中国的秦牧和香港的张君默也写了不少的状物散文，其中不乏成功之作。以下节录两段文字为例：

最大、最有名的风动石，卓立在东山岛城关东门外海滨的悬崖上，高二丈，重数万斤，上小下大，状如一颗硕大无朋的核桃。它的底部呈圆弧形，与基石接触面只有几寸成方，下临大海，危危欲坠。

你看，任何一位游客，只要仰卧在基石上，跷起双脚，像杂技演员“踢缸”那样顶着它，用力一蹬，它便开始摇晃，且大有旋即倾滚而下的架势，吓得围观的游客纷纷往两边躲闪。

你看，东风刮来，它往西倾；西风刮来，它往东斜，倾斜度甚至达到四十三、四度。简直没有一点自尊，没有一丝一毫的骨气！

别看它摇摆不定，由于它上小下大，重心位置很低，所以，不但台风、地震无奈它何，就是当年

日本侵军在海上用炮艇系着钢缆绳来拉它，也不曾把它拉下大海呢！它毕竟没有背叛过脚下的大地，因此，也还值得我们谅解。

（中国 章武）

我喜爱石子，不是因为它的冷和热，实在是欣赏它的声音和形态。别以为它就是死物，试跑到海边观察一下，没有两块石子的形状会是相同的，也没有两块石子的卧态是相同的，然后，再随手拈来两块掷向海腹，你便会发觉它们落水的声音和形态铿锵有致，即使泛起的连连水漪也是各有妩媚的。

（香港 楚滩）

“景是众人同，情乃一人领。”由于作者对景物的兴会各有不同，才展现了散文的多姿风采。

彦火在《夜访秦牧》一文中，记录了他和秦牧的一夕谈的内容。

这位当代散文大家秦牧认为，散文已成为独立的文体。一篇好的散文，必须情与理互相结合、情与景交替互用。正如鲜花一样，喜欢不喜欢某种花悉听尊便，但不能因个人喜

欢某种花，就否定另一种花。当然写散文也可似偏重抒情或偏重说理而成某一类的散文。他也反对强调某一种文风而排斥另一种文风的做法。他认为题材应该多样化，表现的手法也应该多样化。“只要作品是志在提高人们精神境界和情操的，或者是调剂人民生活的，都应该受到肯定。”

20,23,27.9.1988 星洲日报文艺春秋

注：1988年7月间，星洲日报配合吉隆坡十五家书局而举行“88书展”之系列文学讲座。笔者受邀于24.7.88在马华大厦会议厅主持散文讲座，本文就是这次讲座的讲稿。

1988年10月间，麻坡诗礼麻国中华文学会主办文艺讲座，笔者受邀主讲同样的课题。

1990年5月间柔佛州居銮中华中学举办该校文艺营，作者受邀主持散文讲座，讲稿相同。

丰子恺的画笔散文

1.

丰子恺的漫画和随笔，是他艺术上的两项成就。他用画笔写散文，把散文写得像图画一样优美。他善用美学原理，有时用粗笔勾勒物像，只是寥寥几笔，就见到神韵；有时用细笔描绘世态，却是丝丝入扣，俱见精神。他的画如散文，散文如画。

实际上他的漫画和随笔关系密切，不论是风格和意趣来说，都很相似。他说：“在得到一个主题之后，宜用文字表达的，就写成随笔；宜用形象表达的，就作漫画。”不论是漫画或散文，他都能够把自然与人生的题材化繁为简，也能繁简由之，适得其中。

丰子恺的散文率真朴实，清幽玄妙。“清幽玄妙”是郁达夫在《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中对丰氏散文的评论。他的散文和学院派的散文大相径庭。他写的是随意式的散文，文字清纯，挥洒自如，技巧则隐于无形。在平白如话的婉曲行文中，他夹叙夹议，含有哲理和禅机，隽永有味；写到幽默处，又令人莞尔。这一类清新委婉的散文特点，其魅力在于亲切。这就是为什么丰子恺、冰心、叶圣陶、朱自清、孙犁和沈从文等位作家的散文那么耐读，又历久不衰的原因。我国的前辈作家当中，姚拓的文学语言也属于这一类

文如掌西也計子斗

的，非常有个性，有自己独特的声音。

2.

丰子恺生于一八九八年，浙江省石门湾人。祖上开染坊，到清末时家业已经衰微。父亲为清末举人，在家设立私塾教导学生。

丰氏九岁时父亲就去世了，由母亲抚养成人。一九二一年，丰子恺留学日本研究音乐和西洋画。回中国后曾任上海大学、复旦中学、浙江大学及立达学园等校的美术教授，国立美术专门学校校长。

一九三七年，日本侵略中国，丰子恺的故居缘缘堂为日本军机炸毁，他逃难到大西南去，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抗战胜利后，他回到上海居住，除教书外，也卖画卖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他参与全国文教团体活动。文革期间，他受到严厉的批判，于一九七五年含冤长辞。一九七八年他获得平反，再度受到表扬。丰氏一生最大的成就在于绘画和文学，也功在教育，是苦学成功的读书人楷模。

丰氏治学的成功，得益自两位良师的指导。丰子恺就读于杭州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时，受到音乐兼图画老师李叔同（即后来的弘一法师）及国文老师、文学家夏丏尊的赏识。

丰氏在李叔同导师的鼓励和点化之下，绘画和音乐的进程迅速，思想和品格也深受李师的默化而成型，为人诚恳认真。文学方面，丰氏获得夏氏的教益匪浅，师承有自。夏丏尊是近代的中国散文大家，作品的语言淡雅朴实，文字清纯流丽，构造严密，思想深邃，他的《白马湖之冬》是白话散文的扛鼎之作。名师出高徒，丰子恺尽得夏氏的教化，其散文成就更是青出于蓝，高过夏丏尊的。

丰氏在三十岁时皈依佛法，为弘一大师的弟子。他的随笔也像苏东坡和王维那样，从佛法中提高了他作品的境界。丰氏保有童心，这也使他的随笔清新脱俗，温馨感人。

丰子恺的一生，经历了中国大时代的变动期，从清末的辱国丧权，到民初的内乱蜂起，以至于中共成立后的政局风云，因此他对时代的感受是深钜的。

他的作品有的描绘人生世态，有的揭示社会的丑陋和黑暗，有的赞美童真和善良。他探讨宇宙的奥妙，生命的实质，大自然的契机，肯定人性光辉面的积极意义。他的节操和信守、宽怀与爱心、同情与谅解是他人生的定点，并且身体力行，推而广之，至于万物，包容其间。丰子恺心怀天下，希望众生如同一家，和谐地相处在一起。

他的主要散文作品有《缘缘堂随笔》、《子恺小品集》、

《中学生小品》、《随笔二十篇》、《车厢社会》、《丰子恺的创作选》、《缘缘堂再笔》、《教师日记》、《率真集》、《我的读书生活》、《猫叫一声》、《小钞票历除记》、《博士见鬼》等。

3.

丰子恺有良好的中国古典文学的根柢，艺术的禀赋，加上名师的点化和激励，使他学而有成。他通晓英、日、俄语文，译介了大量外国艺术理论和文学作品，从中他获得了丰富的艺术素养，在互会融通之后，使他在艺术上能成其大。

大凡优秀的散文作品都很写真，也都语言凝练优美，富有节奏感，袒露了作家的鲜明个性和感情。散文家都善用比喻、象征和暗示等的修辞手法以达到内容上的寓意，情致和形象的敷设，并求“状难言之景，如在目前”及“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的效果。丰子恺是中国新文学的第一代作家之优秀散文家。那时白话文刚刚从文言文的束缚中挣脱出来，可是丰氏的白话文却没有小脚放大的扭曲现象。相反地，他的文学语言清澈纯净，亲切可诵。

丰子恺有许多杰作，是值得我们作抽样欣赏的。

《口中剿匪记》写于抗战胜利后，当时丰氏回到杭州，

见到老百姓面对官府的横征暴敛，贪污舞弊，以致民生凋蔽。丰氏以牙患比喻官匪，在夹叙夹议中把我（人民）所受的疾苦表达出来。

怎见得像官匪，即贪官污吏呢？官是政府任命的，人民推戴的。但他们不尽责任，而贪脏枉法，作恶为非，以危害国家，蹂躏人民。我的十七颗牙齿，正同这批人一样。它们原是我亲生的，从小在我口中长大起来的。它们是我身体的一部份，与我痛痒相关的。它们是我吸取营养的第一道关口。它们替我研磨食物，送到我的胃里去营养我全身。它们站在言论机关的要路上，帮我发表意见。它们真是我的忠仆，我的护卫。詎料它们居心不良，渐渐变坏。起初，有时还替我服务，为我造福，而有时对我虐害，使我苦痛。到后来它们作恶太多，个个变坏，歪斜偏侧，吊儿郎当，根本没有替我服务，为我造福的能力，而一味对我残害……”

在随笔当中，丰子恺有多篇悼念或怀念师友之作，其中以《怀李叔同先生》和《悼夏丏尊先生》这两篇写得最好。

在悼念李叔同的行文中，他倾吐了他对先师的敬仰和怀念。他以抒情的写法介入了史传的成份，而情和理也相随并行；行文没有伤感的语句，但是真情感人肺腑。以下是《怀李叔同先生》一文的其中一段：

他回国后，在上海太平报社当编辑。不久，就被南京高等师范请去教图画、音乐。后来又应杭州师范之聘，同时兼任两个学校的课，每月中半个月住南京，半个月住杭州。两校都请助教，他不在时由助教代课。我就是杭州师范的学生。这时候，李先生已由留学生变为“教师”。这一变，变得真彻底：漂亮的洋装不穿了，却换上灰色粗布袍子、黑布马褂、布底鞋子。金丝边眼镜也换了黑的钢丝边眼镜。他是一个修养很深的美术家，所以对于仪表很讲究。虽然布衣，却很称身，常常整洁。他穿布衣，全无穷相，而另具一种朴素的美。你可想见，他是扮过茶花女的，身材生得非常窈窕。穿了布衣，仍是一个美男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这诗句原是描写西子的，但拿来形容我们的李先生的仪表，也很适用。……李先生的服装，才真可称为生活

的艺术化。他一时代的服装，表出着一时代的思想与生活。各时代的思想与生活截然不同，各时代的服装也截然不同。布衣布鞋的李先生，与洋装时代的李先生、曲襟背心时代的李先生，判若三人。这是第三次表示他的特性：认真。

丰子恺深知美学原理和音律，善用简洁的画笔去勾勒物象，同时节奏优美。许多小事物，一到他的笔下，便见物趣和情趣，而且能够翻出新意。他写蜜蜂、蝌蚪、白猫等，都如他的漫画一样，趣味横生。譬如说他写杨柳，杨柳就成了人中君子，能高能下，会饮水思源。他这样写道：

杨柳的主要美点，是其下垂。花木大都是向上发展的，红杏能“出墙”，古木能“参天”。向上原是好的，但我往往看见枝叶花果蒸蒸日上，似乎忘记了下面的根，觉得其样子可恶。……它长得很快，而且很高；但是越长得高，越垂得低。千万条陌头细柳，条条不忘记根本，常常俯首顾着下面，时时借了春风之力，向处在泥土中的根本拜舞，或者和它亲吻。好像一群活泼的孩子环绕着他们的慈

母而游戏，但时时依傍到慈母的身边去，或者扑进慈母的怀里去，使人看了觉得非常可爱。杨柳树也有高出墙头的，但我不嫌它高，为了它高而能下，为了它高而不忘本。

以儿童入题，占丰子恺随笔中的一个很大的比重。作者童年的回忆，眼前儿童的悲欢之情，都能激动他的心绪，发为嚶嚶互鸣的声音，低回的软语。这是因为作者有一颗童心，对孩子有爱心的缘故。《山中避雨》这一篇显露了他的童心，发出温馨之情。

前天同了两位女孩到西湖山中游玩，天忽然下雨。我们仓皇奔走，看见前方有一小庙。庙门口有三家村，其中一家是开小茶店而带卖香烛的。我们趋之如归。茶店虽小，茶也要一角钱一壶。但在这时候，即使两角钱一壶我们也不嫌贵了。

茶越冲越淡，雨越落越大。最初因游山遇雨，觉得扫兴；过时候山中阻雨的一种寂寥而深沉的趣味牵引了我感兴，反觉得比晴天游山趣味更好。所谓“山色空蒙雨亦奇”我於此体会了这种境界的好

处。

我借了胡琴回茶店，两个女孩很欢喜。“你会拉的？你会拉的？”我就拉给他们看。手法虽生，音阶还摸得正。……在山中小茶店里的雨窗下，我用胡琴从容地（因为快了要拉错）拉了种种西洋小曲。两女孩和着了歌唱，好像是西湖上卖唱的，引得三家村里的人都来看。一个女孩唱着“渔光曲”要我用琴去和她。我和着她拉，三家村里的青年们也齐唱起来，一时把这苦雨荒山闹得十分温暖。…

…

丰子恺也在随笔中也流露出佛家的世事无常之说和超脱世外的思想。他的《秋》、《渐》和《午夜高楼》等都有佛学的境界。《午夜高楼》写小镇的夜声，幽远凄清，对夜声的描绘准确又传神，发人幽思。

丰子恺有一幅以山为题材的漫画，画上的题词是“山到成名毕竟高”。其实用这句题词来形容丰子恺在漫画和随笔方面的艺术成就，也很恰当。

15.10.1990 南洋商报南洋文艺

丰子恺的儿童漫画

丰子恺用毛笔漫画儿童的生活情态，开创了中国儿童漫画的艺术天地，独树一帜风格，受人赞赏。

丰子恺(1898-1975)，浙江省石门镇人。他幼年时进私塾学堂受教育，毕业于浙江省第一师范学校，而后留学日本，研究西洋画和音乐。

丰子恺从日本回返中国之后，就担任立达学园的教职，又历任浙江大学副教授、国立艺术专科学校教授等职。他又通晓英、日、俄语，一生勤于读书、译著和作画，因此他的学问渊博，对中西文化也相互融通，有容乃大。他的译著超过一百六十部，画作上千，艺术成就很高。

丰子恺早年在浙江省第一师范学校就读，受业于图画兼音乐导师李叔同及国文老师夏丏尊二人，为他日后的文艺创作奠定基础。当时李叔同发现了丰氏的艺术天赋之后，便尽心指导他作画，这深深地影响了丰氏的绘画创作。1918年，李叔同三十九岁，他皈依了佛法，后来成为南山律宗的弘一大师。丰氏也在1927年皈依为弘一大师的弟子，此后佛陀的精神也转化为他的艺术的慧思和人生的睿智。

日本侵略中国后，丰子恺的缘缘堂故居毁于战火。在这个时期，他携眷流徙于湖南、湖北、广西和贵州一带，生活艰苦。他曾经一度到台湾去谋求安身，但不久又从台湾来到

厦门住了一个时期，再北上上海定居。由于时局不靖，中国面临内忧外患，丰子恺在生活的煎熬中增长了人生阅历，因而深化了他的艺术创作的内涵。

丰子恺在生活中，非常喜受孩子们。他羡慕孩子们不受世俗习惯的约束，生活得自由自在，纯洁可爱。年纪愈小的孩子，他的世界就愈大。因此，他玩味从儿童生活中得来的感兴，也描绘这种感兴。这就是丰子恺漫画儿童生活情态的因缘。

他的儿童漫画题材，有揭露旧社会穷苦儿童的不幸，有表现儿童的纯真可爱。在他的天真烂漫的童心中，含蓄地透露了他对孩子们的现在和未来的关爱和眷顾。他又是笃信佛法的人，在儿童漫画中注入他的出世，入世和忧世的精神，因此，他的画能移人性情，度人心灵，感动孩子们的心。

丰子恺的漫画，包括儿童漫画在内，都有中国画风的萧疏淡远，却又不失西洋画的活泼酣恣。他的画线条简练、流畅，只寥寥几笔，就显凸物象的神态，工巧则藏在其中。他的画看似平淡，其实是温腴的；画似拙讷，其实是内涵智慧的，这就是丰子恺漫画的风格，有着浓厚的民族特征。他有一首诗，很能够描绘他的儿童漫画风味：

泥龙竹马眼前情，琐屑平凡总不论。
最喜小中能见大，还求弦外有余音。

1928年，丰氏发愿绘制《护生画集》，先画第一集的五十幅，为弘一法师五十岁祝寿，以报知遇之恩。以后大师六十岁，丰氏再画六十幅护生画（二集）献寿，大师冥寿七十，他又续绘护生画七十幅……直到1973年，丰氏又绘护生画（第六集）一百幅，圆满完成纪念弘一大师百岁冥寿的功德。丰氏尊师重道的德行，从绘制《护生画集》的行动上已表露无遗。《护生画集》的内容都是劝人向善，爱护动植物，休弃杀生摧残的念头。六册《护生画集》都适合儿童观赏。

1950年，丰子恺也为周作人漫画《儿童杂事诗》共六十九幅。图与诗的璧合，是这本诗集的特色。

除上述所提到儿童漫画之外，丰子恺结集出版的儿童画集还有《学生画集》、《儿童漫画》、《儿童生活漫画》、《幼幼画集》、《丰子恺儿童漫画》等。他的儿童漫画数量很多，流传也很广，深受孩子们的欢迎。

纵观丰子恺的一生，他致力于文教工作和艺术创作，从不言悔。他在文革期间遭受批斗，身心备受摧残，但是他每

日还是摸黑早起，坚持创作。他一生所积累的作品，可说是著作等身。1978年，丰子恺获得平反，昭雪前耻。虽然他已不在人间了，可是他那高大的形象，令人景仰；他的艺术作品，是他不灭的生命光辉。

24.8.1990 星洲日报星云





星星相会，星空分外明亮；文学交流，波澜更是壮阔。现在，世界华文作家们都忙着用文学建筑桥梁，也忙着建立共同的文学灯塔。

当前马华文艺工作者的困境

日本汉学家今富正己教授今年初在新加坡国际华文文学营上说过：

①马华文学能够在重视金钱的商业社会里发展起来，，不但具有坚强的文学阵容，而且具有特色，“真不简单！真伟大！”。

②新马华文文学的前途，主要是看这两个国家的华文报的前景而定；如果华文报陷入困境，就不利于马华文学的发展。

③马新文学在创作上应该寻求自己的新风格和形式，并且用浅白易懂的文字，表达高度的思想内容；模仿大陆和台湾的文学创作是不对的。

④华文水准在下降中，作品的质和量都会受到影响，但只要不断努力，华文文学仍旧会继续存在的。

今富正己教授的话很有见地，他说出了：

①马华文学的成就，

②报章主宰马华文学的兴衰运程，

③马华文学的笔端取向，

④现阶段马华文学的困境。

现在我只谈谈第4点：在马华文学的困境中，作家所面临的难题。

在我们的社会中，一个人有了金钱就自然有地位，文艺工作者用心血去照顾的马华文学却是不会下金蛋的鸡。作家以思想劳动，去建设高层文化的宝塔，反映本邦人民的精神和生活面貌，又通过抽象的潜移默化的作用，影响人们的思想意识。因此，我们可以这么说，一个民族的文学没落，也就是一个民族没落的象征。文学艺术是民族的灵魂，因此英国人说过：“我们宁可放弃印度这个殖民地，也不愿意放弃莎士比亚这位大作家。”我国独立时，马来同胞就高喊‘语文是民族的灵魂’的口号，然後确实地用文学和语言作为团结民族和国民的工具。马来作家成为民族斗士，地位崇高，可是马华作家就毫无地位可言。

不错，华人热爱华教，但与华教息息相关的马华文学却给撇在一边。华人对争取舞狮舞龙成为国家文化环节非常努力，但对文化精粹的马华文学却不热爱。这是很矛盾的事。

马华文学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报章，对培养本地作家和鼓励文艺创作这方面也做得并不理想。我们的报纸有各种副刊，但是多为剪稿所充塞，不然就刊载用重金购买而得的港台流行小说或消闲作品，对本地作家的作品并不重用。於是报馆捧红和养活了港台流行小说或武打小说家，间接抑制本地作家的发 展。

报社发给本地作家的稿酬也很菲薄，20多年前千字五元，20年后千字七元或十元，多一点的就有十五元左右。这千字七元或十元的稿费，在通货膨胀的今天，有如脱脂奶粉：即冲即溶。难怪马华文坛的作家有如散兵游勇，三五年来一批新人，三五年後去一批旧人，能够持续下来的并不多，这无形中就埋没了许多有才华的作家。本邦的写作人，大多利用业余时间从事创作，这也对写作不利。是武林高手的，必然要拳不离手；要当歌唱家的，就得曲不离口；作家要有成就，同样的要投入才行。

报章既然知道肩负发扬马华文学的任务，何不弃港台而转向马华作家索稿，鼓励和培养本地文艺工作者，让他们专业写作，我相信假以时日做下去，不但出现专职作家，也会出现更多优秀的作品。

出版和发行文艺书也困扰着马华作家。本邦作家出版文艺书，不外是自资、受人资助，或由出版社或获得出版基金而出版。书印出之後，又没有发行网，要拜托朋友四下推销，才能有一两千本的销数。目前，文艺书的对象是中学生，但如果没有得到校长的答应和老师的推介，就没有销路可言。有的读者又不买本地文艺书，只买港台的。最要命的是社会上没有读书风气，大部份人视书如仇。社团多数没有图书馆，

这对收藏和传阅文艺书没有帮助。

以近年来的事实为例吧，1976年建国日报推出《建国文艺丛书》，由于销量不理想而告停止出版下去。同年，吉隆坡人和出版社为本地作家出版第一辑文艺丛书后，也由于销路欠佳而停止出版下去。究其原因是社会人士及学校都没有加以响应和支持。

反观马来文坛，马来文学得到政府的扶持，又得到商业大机构的资助，民间团体的响应，马来文学已经蓬勃地发展起来。自1972年起，政府设立文学奖，1976年起设立文学斗士奖，并由首相亲自颁发。报章杂志鼓励创作，稿酬从优。全国作家联合会拟定长远计划，逐步推广马来文学。语文局成为马来语文和文学的堡垒，从印刷、出版到发行，甚至作家的版税都照顾得很周到。马来文学作品列为中学课本，佳作编入课文中，供马来子弟研读。影响所及，连大学教授也积极从事写作，他们把思想劳动的成果贡献给国家，建筑他们的文化宝塔。当今马来文学的成就，已超越马华文学，值得我们向他们借镜。

其实我们华人社会是有办法发展马华文学的。譬如福联会早已设有出版基金，热心人士资助出版费用，社团也设立文学奖，只要报社大力扶持本地作家，大马作协再接再厉推

动文艺活动，中华大会堂及董教总发挥十足的影响力，马华文学不但可以存在，还可以发扬光大。像马六甲圣约翰姑务救伤联队，在救伤之余，居然主办征文赛，出版得奖文集，举办文艺座谈会，实在令人感动。如果其他组织也向马六甲圣约圣姑务救伤联队看齐，马华文学还有困境吗？马华文艺工作者还有困境吗？

1.5.1983 星洲日报文艺春秋

●本文是作者应马六甲圣约翰姑务救伤联队之邀，於1983年4月17日在该联队主催之文艺座谈会上的谈话。

荡起双桨

一九八三年十一月十四至十五日，南马文艺研究会主办了第一届青少年文艺营，有八十多位各州文艺青少年参加。十一月十四日入营後，我们和青少年夜宿营内，忽然心里有了一点感触。回想在六十年代，我也和侪辈三次参加过类似文艺营的活动。时年少艾，我已经受到文艺的磁吸，走上文艺的道路。少年行，敢行於前所未行，勇於闯出一条新路，不过当时的文学根柢尚浅，三级跳就要栽倒，想想李白也倨傲过：“我本楚狂人，狂歌笑孔丘。”迈入中年之後，我已趋归淡定，现在竟然成为守营的人，手中像是从前辈那里接过一根棒子似的，又要把棒子传给入营的青少年。

在文艺营里，我感到设营的可贵，它把星散在各地的文艺工作者密集在时空的一个点上，升高文学的温度。我也体会到老、中、青、少写作人结合起来的重要，我们可以集中力量来推动文学的重载。

在文艺营内，老、中、青、少四代同营，可以自由地私相授受文学的机杼。在没有时空阻隔之下，前辈的谆谆之言，殷望的眼神，即使晚辈的意见相反，或持之偏激，都可以在恳切的交谈後消弭大半。泛舟在文艺的长河上，我们荡起双桨，向前划去，曲尽源远的幽胜之处。

文艺青少年如果肯向前辈汲取创作经验，然后取精用宏，

便於再加工营造文学作品，必定大有收获。杜甫年轻的时候，看见公孙大娘舞剑器，其传统剑法和外来舞步溶合而成艺术表演，杜工部的慧心早已与之契合，长大後咏之为诗，传诵至今。

初上文学道路的人，也许会觉得写作就是我手写我口那么简单。及至登临之后，才知道无限风光在险峰，不免兴起蜀道难的感慨，并且深切地体会到在攀越文学的峰峦时，必须经历读书、生活和思想的途径，再探索出一条登临的路来。

也许在多年之後，当青少年步入不惑之年时，文艺营讲师的话就会在他们的耳际回响。

甄供：我们要从优秀的文学作品中，汲取营养以丰富我们作品的内容。

龙田诗：对待艺术，不能以绝对的态度而把它定于一尊。

田流：我要大家以“两意三心”来搞文艺，那就是意志要坚定，意念要明确，是谓“两意”；要有信心，恒心和爱心，是谓“三心”。

杜诚：文艺界的老、中、青必须结合起来，增强力量，共同为建设文化而努力。

丁云：不要做别个作家的投影，做一个属于自己的杰出作家。

锤夏田：写小说讲求“典型”与“共相”，必须反映社群整体的生活面貌，时代背景，这样才能把马华小说，推向更高的水平去。

黄崖：向下扎根，向上结果。根要植在传统的土壤里，吸收养料，结出新的果实来。

我总认为，在创作的道路上，别人影响了我们，我们也会影响别人；别人鼓励过我们，我们也鼓励别人。在相辅相成之下，文学的河流淌过一个年代又一个年代。

虽然我们慨叹时下本地的语文水准越来越低落，读书的风气有如家道中落。这个年头，录像带又氾滥成灾，电视偏于娱乐观众，青少年的剩余时间又顾曲於歌星，流连於超级市场。可喜的是还有很多青少年不为物役，在迷蒙的马华文艺河流上荡起双桨，向前划去！

1.2.1984 星洲日报文艺春秋

马华文学运动的再出发

五千年文化跨海薪传片纸零缣足表时贤百折不挠成伟业。
六十载史料红羊劫剩承先启后还期我辈万方多难策中兴。

1.

晚近几年，马华文艺活动的波浪一个推拥一个而来，逐渐掀起高潮。

就以今年二月间马六甲中华总商会承办的“马华文学史展”来说，参观的社会人士非常踊跃，人数超过一万名。三月三日至四日，大马福联会成功地举办“双福文学节”，情况热烈，这两项文艺活动都是大规模而又有影响力的。

其实，上述的两项文学活动，是1983年文艺活动的延续。1983年的国际华文文艺营、作协的讲习班、雪兰莪中华大会堂的马华文学史料展览以及南马文艺研究会的青少年文艺营都是一波又一波的浪潮。其中年初在新加坡举行的国际华文文艺营备受各方瞩目。十一月间雪兰莪中华大会堂主办的马华文学史展的震幅最大，余波外延。十二月下旬马华文学史展由新山中华公会教育组承办，今年一月初由森美兰中华大会堂在芙蓉展出，二月间巡回到马六甲展览，并继续推移到别州去。

以目前的文艺活动看来，马华文学配合了华人社会的文

化觉醒运动，已进入复兴时期了。所有作家必须投入这项活动，发挥群体的力量，复兴马华文学

2.

目前的马华文学运动的兴起原因，肇始于华人社会对本身在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和教育领域里的式微而触发的。现在华人社会已经洞察到，语文是民族的根，作为高层文化的马华文学，它的重要性是超越文化表层的舞狮舞龙表演和孝亲敬老的课题的。华人社会对文化的觉醒，使到社会人士和社团大力支持与推动文艺活动，一时此起彼落，形成一波又一波的浪潮。

华人社会对文化觉醒的一个显著的例子，是向政府提呈文化备忘录。

事缘1982年之初，我国文化及青年体育部在重新检讨国家文化实施十年后的状况时，征询於文化机构及民间团体，俾便作为今后政府塑造国家文化的参考。华团及社会贤达对它的反应非常热烈，雪兰莪中华大会堂、大马文化协会、董教总等重要团体召开联席会议，通过联合筹办全国文化大会的提案。各地的华团也为此开会讨论文化课题，马华文学一直成为被讨论的项目，这是过去所没有的现象。雪兰莪中华

大会堂的代表团更走访各州，与各地华团代表交换意见，1983年3月27日华团领导人在檳城召开全国华人文化大会，一致通过拟就的国家文化备忘录。3月30日，这份备忘录由雪兰莪中华大会堂会长邱祥炽率领代表团提呈文青体育部。在文化备忘录中，马华文学受建议纳入国家文学的范畴，马华文学作品得以提名国家文学奖；国家的文化或文学代表团应包括各民族文化或文学工作者等等，这些都表示华族对马华文学的愿望。

持平而论，马华文学在六十多年来的演变中，其服务对象早已确定。从早期存有的侨民意识，到30年代的“马来亚本位思想”成形，进入战后时期所树立的“马华文艺的独特性”标杆，至50年代已高举“爱国主义”的文学大纛。马华文学受到中国文学母体的孕育，断脐后已成为一个独立的个体，它既不屬於中国文学的一部份，也不是台湾文学的附属品，而是属于马来西亚的文学，理应屬於国家文学的一个环节。

然而，在提呈文化备忘录之后，华人社会并未见到政府对它的重视，加上招牌事件，舞狮表演的申请准证问题，华族已面对政、经、文、教的急转弯，自然调整重心，造成了向心力，社会人士就不期然而然地去怀抱这饱受风寒吹袭的

马华文学。

3.

文学原本是应社会的需要而产生的，文章为合时宜而写，作家则因时制宜而进行创作。文学一旦远离时代和社会的需要，它只是成为少数人的玩物，文学史上的目录吧了。像中国的赋，工丽谐靡的颂圣文字，只是文学上的行尸走肉。像五四运动之后，白话文学代替文言文学而请纓上阵，这也是应了时代的需要而产生的。

通常，社会的变动就会带动文学的发展：新思想的冲击力，使文学的内涵更丰富，反过来影响社群。马华文学发展过程中的四个主要高潮期是1925—1931的南洋新兴文学运动、1937—1942的抗战文学运动、1945—1948的反殖民主义文学运动和1953—1956的反黄运动。这些文学运动无不和社会变动与社会运动相连在一起。

文学的最大功用，就是它在社会运动中造成冲刺的力量和对社会机动的驱策之力，使社会运动掀起波澜壮阔的景象，达到目标。

例如马华文学在1937—1942年间，就经历了中国抗战、太平洋战事及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局。在风云诡谲的年代里，

马新的社团、商会以及人民，展开了“抗战救亡运动”、“反侵略运动”和“抗日卫马运动”，马华文学也投入爱国的时代洪流里，汇入救亡和反侵略的社会运动的浪潮中，掀起惊涛拍岸的景象。

那时的文艺工作者，除了在报章向敌人文诛笔伐之外，有的走向前线抗战，有的走向街头表演街头戏、朗诵诗歌，或走向乡城，在壁报上、板报上以短论、杂文、报告等作为和敌人短兵相接的方式。——表现在文学上是作品在质和量提高，焕发的文学革新精神。

4.

从上述的例子看来，我们知道，文学运动的展开，必须延伸到社会的每一个层面去，再从社群的支持和反应，达致水到渠成的地步。以现阶段的马华文学运动来说，社群的反应相当热烈，也扩展到各个层面去了。方北方的长篇小说《头家门下》已改编成电视连续剧，在我国电视台放映。各民族诗歌朗诵会破例在语文局举行，语文局的翻译咨询委员会宣告成立，华裔人士为马来作家——本届国家文学奖得主乌士曼·阿旺举行《祝福大地之夜》，尤其是雪兰莪中华大会堂举办的“马华文学史展”，和大马福联会及雪兰莪福建会馆

两机构联办的“双福文学节”，其规模犹胜文艺团体主办的文学活动。其他方面如文教团体举行的文娱节目也穿插表演艺术项目像马华诗歌朗诵、戏剧表演等等。我们可以说，马华文学已和社会取得密切的连系；如果再推而广之，成为人们休闲生活的一部份，那就更好。

今年三月四日，我有幸参加“双福文学节”的文艺讲座会。陈育青副博士在他主讲的《华巫文学的译介与交流》课题上说，华巫文学的译介与交流，对促进两大民族的了解非常有用。可是这一方面的工作，我们以往做得不够。由于缺少文化交流，马来社会，甚至马来领袖和马来作家对马华文学和华人文化都不大了解。如果马来同胞对我们的马华文学有深入的了解，他们就不会把马华文学指为“侨民文学”或“移民文学”了。

郭洙镇律师也在讲座上明言指出，如果马华文学的活动仅局限於华人社会，没有获得超过人口半数的马来同胞的支持，那么我们的文学活动和文学作品影响力将不够恢宏博大，甚至不能成功，因为马来西亚是个多元种族、多元文化的国家。

两位主讲人的意见都很正确，这也是在现阶段马华文学运动中我们应该努力去做的工作。

陈育青副博士在比较华巫两族青少年阅读文学书籍的问题上说，马来同胞和青少年包括学生在内，除了阅读马来古典文学之外，主要的还是阅读当代马来作家的文学作品。学府也和马来文学息息相关，马来文学书籍成为马来学生的读本，政府考试的必读之书。马来文学和马来社会结合得那么好，与时代共呼吸，这是他们成功的地方；再加上政府的扶持，使马来文学蓬勃地发展起来。反观马华社会，阅读风气低落，青少年阅读的文学作品，首为中国和港台的，次为欧美文学的翻译作品，最后才是马华文学作品。中学的华文课本，中国的古典文学和新文学占了重要的部份，马华文学作品只占了一个微小的部份，不能和学生取得密切的联系，发挥它的力量。陈副博士语重心长地说，为配合时代的需要，马华作家必须受到鼓励，马华文学必须受到重视，才能与人争长短。他毫不讳言地说，报章发给写作人的稿费太菲薄了，必须提高。

从陈副博士的谈话中，我们可以找到马华文学作品滞销和马华文学不能蓬勃发展的原因。而马来文学的高速发展是它与社群、学府以及时代结合起来的成果，这种发展方式可以作为我们推广马华文学的好例子。

马华文学作品当中，有不少是优秀的；我们可以从方修

主编的《马华新文学大系》和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新马华文文学大系》收录的作品中见到一斑。中学的华文课本或许为了学子将来出国升学不能多收马华作品，但可以增印马华文学作品选集，作为辅助读本，这对马华文学发展有所裨益。

五千年文化跨海薪传片纸零缣足表时贤百折不挠成伟业
六十载史料红羊劫剩承先启后还期我辈万方多难策中兴

这是“马华文学史料展览”会上的对联。这幅对联概括性强，也写得很有气魄。它既说出马华文学的渊源，顽强的生命力、时贤发展文学的业绩，也写出六十多年来马华文学在艰难的环境下迂回前进的情形。

“万方多难策中兴”是警句，也有指示。如果我们不振臂奋起，中兴马华文学，那么，待文化觉醒的社会运动一过，就不利于马华文学的发展了。

12, 14. 5. 1984 南洋商报商会

1985年3月第4期《亚洲华文作家杂志》转载

文学团体与马华文学

马华文学在忧患中成长

六十五年来的马华文学，在忧患中成长。内在方面，它不受本地华人社会的重视，其地位比不上舞狮舞龙。它的赖以图存的是报纸副刊和生命短暂的期刊，并且受到中国和港台文学作品挤迫，反主为宾。中国与台湾的文学思潮，也影响了作家们，产生宗派对峙与门户之见，妨碍作家们的交往。马华文学和学府脱节，青少年学子读中国文学史、古典和五四时代的文学作品，对马华文学茫然不知，他们甚至以为马华文学不值得一读。外在方面，在殖民地时代，马华文学受到压制，独立後也没有得到政府的扶持，华文水准每下愈况，这也影响马华文学的素质。

生於忧患的马华文学，虽然经历大时代，由於客观环境的局限，文学活动的空间小，作家的流动性大，因此马华文学缺少重点作家，也缺少重部头著作。虽然如此，马华文学的生命却是坚韧的，它仍然有一定的成就。吴天才教授在《马来西亚华文文学史料展览纪念特辑》(1983)的刊首语中说：“马华文学诞生迄今已逾六十二载，出版了数百种报纸文艺副刊、杂志期刊和丛刊，文艺作品单行本约二千本，这些作品都是

前辈作家们刻苦奋斗、辛勤耕耘的心血结晶，闪烁着他们智慧的光芒，其价值与贡献早有定论。然而这批珍贵的文学遗产不但没有得到好好的妥善的保存，反而为一般人所忽略、漠视、糟蹋和唾弃，这是多么令人感到痛惜。”

总之，我们的文艺界先辈，从事的是人弃我取，类似拾荒的创作活动，他们的精神，感召新一代的作家。

文学与文化的相生相长

文学是置身於文化中成长的个体，文化必须依赖文学的哺养而见其丰盛。因此，文学必须和政治、教育、历史，社会环扣在一起而轮转起来。但是，文学必须是独立的，不可成为政治的工具。马来文学就是置之於文化活动中而有超越的进展。

马来文坛的“全国作家协会”(PENA)，在六十年代结集了全国十三个文学团体，组成“全国作家协会联合会”(GAPENA)。这个全国性的文学团体，荟萃全国马来作家的心力与劳力去进行创作和推动文艺活动，并把马来文学紧扣教育、经济、政治和社会等齿轮，使它成为机动体。“全国

作家协会联合会”这部耕耘机把瘦田耕犁为文林的沃土。

我们看到，马来文学借着政治力量而推广开来；马来文学和教育结合而植根於新生代；马来文学取得半官方机构（如语文局）和私人大企业（如益梳汽油公司）的资助而举办大规模的文学活动；马来文学得到社群的拥趸而移易民族的精神面貌。

他们做到了，用文学来建设国家文化，用文化来发展国家文学。这种方法是值得我们借鉴，作为发展马华文学之用。

文学团体密集取暖

在马华文学史展中，我们可以看到整个马华文学的发展过程。史展的工委，依据文史家方修所规划的马华文学分期七个阶段而展出：

1. 战前时期：包括1919-1925的萌芽时期（继承中国五四运动的精神），1925-1931的扩展时期（新兴文学运动），1932-1936的低潮时期（马华文学本位思想的出现），1937-1942的初繁盛时期（救亡抗战运动）；
2. 日治时期：1942-1945的黑暗时期；

3. 战后至马来亚独立前的时期：包括1945-1948的战后初期（确立马华文学的独特性和指导理论），1948-1953的紧急状态，1953-1956的反黄运动时期；

4. 马来亚独立时期：1957-1963爱国主义文学的倡议；

5. 马来西亚成立初期、新马分治时期：1963-1965马华文学与新华文学分家；

6. 第一个十年：1965-1975的低潮时期；

7. 现代：1976-1982的文化觉醒与文学复苏时期。

从上述的文学进程得知，马华文学一向与社会运动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其服务对象是本地的，不是外国，这也是马华文学的不朽之处。

我要侧重於介绍的是近十六年来，马华文学在六十年代时期的低潮时期，到七、八十年代的文化觉醒与文学复苏时期，马华文学团体的活动和它们对马华文学的贡献。

远在1929年，马华文学就有第一个文学团体：“南洋学术研究会”，此外，尚有“青年励志社”。

文学团体方面，虽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後，就有人倡组过，但是都没有成功。像倡组“星华写作人协会”（1945）、

“星华文艺协会”（1947）、“文艺写作者协会”（1956）、“马华作家协会”（1967）等文艺性团体，都因了注册等问题而溃

散。

就在六十年代马华文坛因马新分治及突发事件，时局诡谲时期。在西马方面先後出现了两个文学团体：霹靂文艺研究会(1968)和南马文艺研究会(1969)。迈入七十年代，北马的天狼星诗社于1973年成立，1978年马来西亚写作人(华文)协会崛起於首都。文学组织的成立，表示写作人由个体走向团体，以密集取暖，进而温热马华文坛。

●霹靂文艺研究会成立于1968年7月31日，在徐持庆、李锦禧、张顺兴、邓英杰等职要策划之下，展开了一系列的活动，为北马文艺界带来新气象。该会所进行的活动，包括文艺讲座会、征文赛、书画展、话剧、音乐欣赏会等等，此外另有小组活动，像中文研究组、写作研究组、美术组、国语研究组、影艺组、歌咏组等。不过在三数年之後该会却沉寂下来。

●南马文艺研究会成立于1969年9月30日。从早期的以文会友，研究创作问题，到推动文艺活动，出版丛书，培养接班人等。它一直把团体的余温，加诸马华文坛。南文会在最初成立的前十年，从不向外募捐，全靠会员乐捐进行活动。柔、甲两州文友经常聚会，交换创作心得。

南文会主动与其他社团取得连系，举办许多活动，包括1969

年的“大马儿童影展”和“陈培智画展”，1970年的“星马少女专题影展”，1971年的“黄老奋个展”（毫芒雕刻）和“李晋华儿童专题影展”，1974年的“国际名家艺术作品邀请展览会”，1975年的“五人影展”，1976年的“国庆儿童画展”，1980年的“黎农生画展”等。

文艺讲座会则经常与中学联办，对象是中学生。

为培养和鼓励文艺接班人，南文会自1975年起主办“马华青年文学奖”至今已有六届。1983年主办“全国青年文艺营”，也极富意义。

南文会出版的书籍：1.《南马文丛》，计有年红小说集《夜医生》、梦平小说集《早风》、梁志庆散文集《向阳的生命》、静华的诗歌集《土地的儿女》、端木虹的小说集《从黑夜到天明》、爱薇小说集《晚来风急》、诸家著论文集《文艺论坛》、方理散文集《迟来的喜讯》及艾斯散文集《赶路》；2.《南风文丛》有爱薇散文集《面对青山》；3.《艺术丛书》有陈庆昌书法《宋文天祥正气歌》；4.合集《成长》；5.《资助丛书》：端木虹诗集《湖的传说》和梁志庆的《黄花乡镇》。

参与推动会务的南文会职要是年红、方理、静华、高秀、陈庆昌、蔡淡、梦平、端木虹、林过、韦谈、郑玉礼、浩于

豪及梁志庆等人。

●天狼星诗社於1973年2月成立，当时的社长是温任平，执行编辑温瑞安，总务黄昏星，文书蓝启元，财政周清啸。

诗社并非专注于诗的创作和研讨，也从事散文、小说创作和文学评论。诗社对培养文学的新生代的努力和建立艺术事业为职志的坚持，十年来不曾松弛过。诗社的成员经常举行文学研讨会、辩论会、讲座会，探足于现代主义文学的幽胜之处。历任社长温任平曾于1973年11月受邀赴台出席“第二届诗人大会”，1978年2月他代表诗社向大马华人文化协会主办之“文学研讨会”提呈论文《马华现代文学的意义与未来发展：一个史的回顾与前瞻》。1977年及78年诗社主办“大马现代诗奖”。1981年底该社谱诗入乐，制成唱片唱匣《惊喜的星光》，使“现代诗不再是哑了的缪斯”，让现代诗通过歌的媒介和音乐的感染力，在群众中唱和起来。

1984年4月14及15日，天狼星诗社为纪念马华现代文学25年而举办“全国现代文学会议”和“现代诗发表会”，对现代主义文学的发展有深远的影响。

诗社出版的著作计20册，其中11册是诗集。它们是温任平编的《大马诗选》，温瑞安的诗集《将军令》，张树林编的诗集《大马新锐诗选》，温任平著诗集《流放是一种伤》，

张树林著诗集《易水萧萧》，温任平著诗集《众生的神》，蓝启元著诗集《橡胶树的话》，沈穿心著论述集《传统的延伸》，合集《走不完的路》，张树林著散文集《千里云和月》，合集《天狼星诗选》，温任平编论述集《愤怒的回顾》，温任平著论述集《文学观察》，合集《风的旅程》，合集《青苔路》，川草著诗集《晨之诞生》，合集《爱莲说》，谢川成著论述集《现代诗诠释》，雷似痴著诗集《寻菊》及江振轩著诗集《茨厂街》。

每年的端午节，社员都举行聚会，并出版诗人节纪念刊，自1967至1984年间共出版九份。诗社早期属下的十个分社，也各自出版油印或手抄本期刊，虽然在1976年总社为集中人力物力於一社，废除分社，但分社之成员仍然出版他们的刊物。

天狼星诗社能有今日的进展，其他社员像张树林、沈穿心、谢川成、程可欣、林若隐、川草等，都是参与推动会务的积极份子。

●马来西亚写作人（华文）协会於1978年7月29日获准注册为合法社团，并于9月29日举行成立典礼，产生第一届理事会，阵容坚强。协会的主席：原上草，副主席：方北方、锺夏田，总务：孟沙（正）、慧适（副），财政：金苗（正）、

柯金德（副），中文书：陈蝶，国文书：庄延波，联络主任：杰伦（正）、马汉（副），研究主任：年红（正）、温任平（副），出版主任：端木虹（正）、沈钧庭（副），发行主任：梁良贯（正）、江振轩（副），福利主任：丘梅（正）、诗悌（副），理事：雅波、凝秀、魏萌、宋子衡、冰谷、陌上桑，查账：林洛人、川谷。

作协以首都为重镇，1980年开始购置会所。自从作协成立後，就展开活动，在全马多个地方兴起波澜，推涌马华文学运动的浪头。

在举办或联办文艺讲座会、座谈会及演讲会及研讨会方面，重要有下列几项。1978年10月8日参与南洋商报主催“三大民族写作人座谈会”，讨论如何促进文学交流及彼此面对的文艺课题。1979年4月7日及8日在波德申举行“文学工作营”，12月21日在檳城主办北马文学讲座。1980年4月12日在新山举办“南马区文艺研讨会”，主题是“我们关心马华文艺吗？”1981年2月17日主办新春联欢会，邀请台湾作家柏杨主持一项座谈会。2月19日作协与檳威南大校友会及留台同学会联办“柏杨座谈会”。1982年12月27日与通报等团体联办“国际文学讲座”，邀请台湾的司马中原、新加坡的黄孟文、马文西亚的方北方与韦晕四位作家主持。讲题是“华

文文学的未来趋向”。此外尚有汤亭亭、柏杨及余光中的演讲会。1984年中旬由雪兰莪中华大会堂马来西亚华人文化研讨会工委推动、作协主办的“马华文学研讨会”。

其他的文学活动方面，像在1980年作协庆祝两周年暨筹募文学基金晚宴，共筹得近二万元的义款。1981年底举行的北马区“文学之夜”，共筹获六万余元的文学基金。1982年与通报联办短篇小说征文赛，也很成功。1983作协主办“第一届写作讲习班”、“诗乐欣赏会”，并设立马华文学资料室。1984年主办“南马区文艺讲座会”及“第二届写作讲习班”，对联络文友的感情和培养新秀都很有作用。近年来作协更主动与华裔政党领袖及社团领导人接触，唤醒他们重视马华文学，争取马华文学纳入国家文学主流等工作，都尽了很大的力量。

出版方面，作协自1979年迄今共出版了九期《写作人》季刊。1980年出《作协短篇小说选》，收入短篇创作15篇。在1981至82年间，作协出版了《作协文库》第一辑共12本。文库包括方北方的理论集《马华文艺泛论》、韦晕的小说集《陨石原》、原上草的小说集《水东流》、伍良之的杂文集《长路花雨》、魏萌的小说集《青春的痕迹》、年红的小说集《最后一趟巴士》、孟沙的诗集《四重奏》、梦平的小说集《飞

向子午线》、莫理的杂文集《凉茶集》、冰谷的散文集《流霞·流霞》、端本虹的小说集《含笑青山》及其戈的散文集《铁蒺藜》。

至於东马方面，根据班杜仁的《七十年代砂朥越华文文艺简介》（原载3.2.80星洲日报文艺春秋版）一文中说，东马十年来的文艺团体或文娱社，较重要的有：①启蒙图书室，设有文艺研究组，主办过征文赛；②美声文娱社，推展过一些文艺活动，在先锋日报上主编过副刊。1973年後解散；③晨风文娱社，主办过文艺活动，该社在六十年代後期至七十年代初期在中华日报上编过《晨风》文艺副刊，也举办过征文赛，七十年代中期停止活动；④砂朥越星座诗社，成立于1972年，在先锋日报主编现代派诗刊《星座》。该社出版过《砂朥越现代诗选》及《悲喜集》，并举行过《新诗》展览等活动。1980年初在世界早报上主编《田》文艺双周刊；⑤艺林文社，1974年成年，由砂朥越美里的文艺工作者组成，主催过《文艺工作者座谈会》，出版过一期《艺林综合刊》；⑥砂朥越写作人协会，成立于1978年，会员多在古晋。该协会主办过一次征文赛，出版过徐毅的言情小说《遇》及方秉达的现代诗集《耻外》。该会在世界早报上编过《写作人》副刊。

综观上述各文学团体所展开的各项活动，特别是以西马为重镇的马华文学团体活动，它们努力的工作方向，可归纳为下列几点：

1. 以文会友，加强文友与团体间的连系，进而促进国内外与本国各民族文艺交流。

2. 研究创作问题，培养文艺接班人，并共同致力于提高马华文学的地位，建立马华文学的崇高形象。

3. 协助社团推动文学活动，促使社团及社群资助马华文学事业的发展。

4. 尝试与政党取得连系，要求政党领袖协助争取马华文学纳入国家文学的主流。

5. 出版文艺著作，创造马华文学的业绩。

而这些工作方向都是正确的，并取得一定的成绩。

从文化觉醒到文学复苏的劳绩

自从有了文学团体，这16年来，它们不负历史任务和文学使命。在60年代与社会共赴时艰，马华文学度过低潮时期，在文化的建设上，已见竿影。70年代华裔社会对文

化的觉醒，到80年代带来的文学复苏，马华文学团体的劳绩是显而易见的。

如果让我们回顾往事的话，1974年雪兰莪潮州八邑会馆首开风气，设立“学术与文艺出版基金”，继起的还有雪兰莪中华大会堂及大马福联会设立“文学出版奖金”，资助出版文艺及学术书籍。

政党马华公会在1976年成立马来西亚华人文化协会，加入推动文化行列。

1968，69，73，78年，霹靂文艺研究会、南马文艺研究会、天狼星诗社、大马作协等文学团体，先後如醒狮舞起，飞跃如龙翔，令社会人士驻足和观赏文化的精髓部分，留下深刻的印象。

1983年政党也促请政府吸纳中华文化的优良部分，作为塑造国家文化之用。华团如雪兰莪中华大会堂也向政府提呈文化备忘录，其中要求列马华文学列为国家文学等要点。同年中华大会堂更主办大规模的“马华文学史展”，并由各州各县的中华总商会巡回承办，让华社对马华文学的发展有更深入的认识。1984年，大马福联会暨雪兰莪福建会馆两机构也举办重部头的“双福文学节”等等，这些都是一个又一个的文艺浪潮，强而有力。

马华文学既是文化的重要部分，却不能脱离文化活动而存在。它必须与其化文化活动齐头并进，同时借助社团等各个领域的物力人力，把马华文学推展到社群中去，丰富文化的内涵。换一句话说，马华文学的齿轮，必须扣紧华社，甚至国家的政、经、教等文化齿轮而转动，产生十足的机动力量。

文学团体这保姆，对马华文学的爱尽在不言中，都是以最实际的行动去呵护他，希望他快高长大。各文学团体之间的投缘之道，在于相借相重而已；文心一有灵犀之通，妙在无声胜有声！

29, 31. 8. 1984 星洲日报文艺春秋

1984年12月第三期《亚洲华文作家杂志》转载

注：柔佛州峇株中华商会联合中华公会於29. 7. 84-4. 8. 84承办“马华文学史料展览”。本文是作者于7月29日应承办当局的邀请，在文学讲座会上发表谈话的讲稿。地点是峇株正修学校礼堂。

参考资料

1. 雪兰莪中华大会堂出版《马来西亚华文文学史料展览纪念特辑》(1983)

第一总目录

2. 《新马华文文学大系》史料之部。

3. 《霹靂文艺研究会周年纪念特刊》及《霹靂文艺研究会三周年特刊》

4. 《马来西亚写作人（华文）协会成立大会纪念特刊》。

5. 作协1978-83年年报。

6. 南文会十二周年纪念刊《成长》。

7. 《天狼星诗社成立十周年纪念特刊》(1973-83)。

另蒙李锦宗、张树林及孟沙三位先生提供部分资料，谨谢。

芳草奇花总一春

1.

种族极化是去年社群谈论的热门话题，由于事关国家前途，国人都有责任从事填补鸿沟和建造桥梁的工作，让各民族相与过从，增进感情。作为高层次文化的文学，去年已为补填的工作而效劳，成为马华文坛的一件要事。

马来俗语说：“不相识则不相爱”（Tak Kenal maka tak cinta），各民族必须经常来往，从中去认识彼此的文化和思想理念，用宽容去包涵异同，溶汇成文化的清流。有了文化的认同，各民族的感情自然水到渠成，精诚团结，共建家国。

其实，我国各民族在建国过程和生活中，因文化的交流而融合或涵化，已经出现了大马的特殊文化。华族穿沙笼和著峇迪衣的不乏其人，马来同胞在节日派送红包也成习俗，华巫人士共进印度人的佳耐面包时，咸认可口又可乐。至于在观看球赛时，各族为国手和国脚打气或欢呼，感情都属于大马的。在国家庆典上，各族的舞步也是一致的。这说明通过文化的交流，最容易沟通各民族的思想感情。何况在今天，全世界的文化都在交流着，已融合的典型文化，为世人所共享。

文学是文化的精品，具有潜移默化的功用。文学反映生活，透彻观照作家所从属的社会。它可以净化人类的心灵，

摒除心眼之蔽。马来著名作家乌士曼阿旺於八月九日至十一日在语文局主办的“非马来作家文艺营”开幕礼上说：“多元化的社会，实际上是马来西亚独有的财富。多元种族社会，绝不是国家的一大弱点；相反的，它应当是一种强大的力量和丰富的资源。让我们一起共享这份丰美的文化遗产吧！”

2.

社会运动必须配合文学的力量来推展，使它产生深广的影响力。五四运动在新文学的推助之下，曾经掀起惊涛拍岸的景象。因此诗歌和小说，要比说教来得更有感染力；戏剧和歌舞要比讲座会的收效大。而建造文学桥梁，让各族人士跨越鸿沟相见，消除隔阂，增进感情，是大家应当尽力去做的事。去年“各族翻译谘询委员会”及中华大会堂，都在从事这一方面的工作。

“各族翻译谘询委员会”成立于1983年5月31日。它隶属于语文局的文学创作与发展组，以人道主义作家乌士曼阿旺为首。在三大民族的成员当中，包括三位马华学者与作家，即吴天才教授、年红及陈育青副博士。成立的目的在于通过文学译介与交流互动，促进各民族之间的谅解和亲善。语文局有意把本邦华、英、淡的文学作品，翻译成马来西亚文，

介绍给马来社群阅读。为配合这项活动，《文学》月刊也刊载马华、马淡文学作品月报及巫译的文学作品。这是马华文学进入马来文坛和马来社群的创举。各族翻译谘询委员会日前正着手编印一本巫译的马华短篇小说合集和一本诗歌选集。我以为这一炮必须打得响亮，以消除马来同胞的错误认识，以为马华文学仍是移民文学，而且水准低下。

迈入1984年後，翻译谘询委员会曾经举办了下列几项活动：

(1)1983年中旬主办雪兰莪华文独中诗歌朗诵比赛。

(2)1984年4月6日主办各民族诗歌朗诵晚会。

(3)在《文学》月刊刊载马华及马淡文学作品月报。

(4)1984年8月9日至11日在语文局主办“非马来作家文艺营”。

除了翻译谘询委员会所进行的活动之外，全国写人联合会举办的诗歌节，也邀请华族作家参加。该联合会并决定在1985年举办“非马来作家文学奖”。淡米尔写人协会举行的廿二周年会庆，也邀请华、巫作家参加。

另一桩盛事，是雪兰莪中华大会堂于1984年11月11日主催的“文艺界对话”，对象是马来文坛的“全国作家联合会”的成员。大会堂的代表团包括张景良、陈应德（晴川）、

年红、慧适、吴恒灿、李锦宗、王汉、陈金祥、曾荣盛、陈育青副博士、张永新及王兴文。参与对话的全国作家联合会代表包括主席依士迈胡先(Prof. Ismail Hussien)教授, 秘书积哈地阿巴里(Jihaty Abadi), 财政哈芝哈山阿里(Hj. Hassan Ali), 职要依不拉欣奥马(Ibrahim Omar)。对话的要点包括互译及出版各族的文学作品, 以及作家经常交流, 以增进彼此之间的感情。

严格来说, 目前的文学译介与交流活动, 还是停留在促进各民族的了解和亲善的阶段, 尚未进一步提升到更高的境界。依士迈胡先教授在宣布主办“非马来作家文学奖”时就这样说过: “设奖的目的, 在于鼓励友族应用国语, 不是表扬他们的文学成就。”乌士迈阿旺也说过: “目前, 大家不要对语文局寄望太高, 要求太多, 我们只能一步一步做下去。如果我们操之过急, 就会前功尽弃。”

要是我们回顾一下, 在1977年马大出版社会联合西德出版社出版过一本《马来西亚短篇小说集》, 集子中收入二十八篇本邦各民族的短篇小说, 其中有七篇巫译的马华文学作品, 可惜这一项译介工作, 却遭受马来作家的抨击而终止出版下去。

1978年10月7日马来西亚南洋商报曾经主催过一个“三

大民族文学座谈会”，这是破题儿第一遭的三大民族作家的聚会，当时全国作协联合会主席伊斯迈胡先教授也参与其盛。座谈会上也谈及成立一个秘书处，出版马来文杂志，刊载华、巫、印各族的作品，使它们流归到马来社会去，但后来也没有付诸行动。

从马来亚独立时所进行华译马来文学作品的工作开始，到近几年来巫译马华文学作品的活动为止，是单流改变为交流的方向，扩大了流域。八十年代又是华人的文化觉醒年代，华族基于寻求时代激流中的定力，并探求交流的方位，在文化的进程中确实是向前跨越了。关于这点，我们可从1983年华团召开文化大会并向政府提呈文化备忘录这件大事上，体会到华族对本身文化的眷顾、保存及发扬的意愿：

我国的马来文化、马华文化与印度文化，不论在形式或内容上，已经有别於印尼文化、中华文化与印度文化。它们不但继承各自渊源的文化财富，而且互相丰富，交流与融合，早已成为我国文化不可分割的各个组织部分。在当前情况下，通过介译工作，当有助于促进我国各族间的文化交流，消除一些人为的障碍，特别是对马华文艺的偏见。

对马华文学这文化中的重要环节，备忘录中的陈述也真切中理：

从一九一九年马新文学诞生的那一年起，马新文学工作者已经在创作方面初步确立了注重本地现实的路向。到了三十年代初期，马华文艺界又在理论上确立了以“马来亚”为本位的观念。五十年代，配合着政治上争取“默迪卡”的运动，马华文艺界更提出了“爱国主义”的口号，号召在文学创作上鼓起人民的爱国热情，为实现马来西的独立，民主与和平而奋斗。

随着马来亚独立和马来西亚成立，马华文学界不但沿袭着优良的传统，继续以爱国主义的精神进行创作，激励人民向上向善，而且配合着新的历史时期的要求，还大力展开巫华文学交流的工作，更加致力于增进各民族人民之间的亲善团结，激励同心同德把国家建设得更美好。

我们可以看到，华族对建设马来西亚文化的观点和期望与乌士曼阿旺的并无二致。我们希望马来文艺界，出现多位

像乌士曼阿旺那样具有高瞻远瞩的作家，也希望各民族辐辏於同一个文化圈的轴心，推动历史的巨轮。

3.

我以为，在目前的情况之下，译介与交流这个个体应该拍动它的双翼，才有凌霄的飞行之力。这就是说，除了语文局正在进行的译介与交流的工作之外，华社也同时进行相同的工作。本邦的译创社，设有翻译出版基金的大马福联会及大马华人文化协会，应该发挥作用，甚至集中物力和人力，统筹统办，译介马华文学作品。另一方面，出版马来文杂志，在报章上辟出版位，刊登巫译的马华文学佳作和文章，反映华社言论和意愿，纠正英巫文报章杂志在报道上的偏差，也是当务之急。

时下还有人为文专揭华族社会的疮疤，否定自己的文化业绩，嫌它老土，不够“现代”，这除了打击民族自尊之外，对促进各民族的亲善工作毫无帮助，这些人应当停笔歇歇了。我们不敢自诩华族的文化毫无缺陷，但也有很高的水平。世界上任何一种优秀的文化，都有其麻劣的部分；特别是正当一个民族文化处在式微的时候，低层次的文化必然显露出来。当前华族的困境是一个总结的问题，那就是政治地位的没落，

因而无力挽住华族在文化、教育和经济等各方面的滑落。
如果把华人的困境，归咎于文化方面的缺陷，那是摸象瞎说。

在文化的发展过程中，后人要做的工作是先去芜存菁，
而后加以继承和发扬，其间截取他人文化之长处，也只是光大自己文化的作法而已。

在这大前提之下，大家何不致力于填补鸿沟和建造文学桥梁的工作！

3.3.1985 星洲日报文艺春秋
1985年6月第5期《亚洲华文作家杂志》转载

风物长宜放眼量

一九一九年，中国新文学跨海传薪，为马华文学开拓基业。马中文学虽有同文的渊源，但服务对象各自不同，作家们的笔端取向也互有差别。

六十多年的马华文学，自然不能和具有几千年的中国文学相提并论，可是马华文学仍旧有很多优秀的作品，它留存的时代风貌，民族拓垦的精神和文学的基业，不应该为他们的传人所否定。正当日本和西德等外国学者等重视马华文学之时，作为马华文学传人的，只有光大它的业绩，使马华文学的形象，站立在世界文坛上。文学一旦造成断层，就会使基业造成塌陷的危险，割断语言文字的正常发展和民族精神的延续。因此，当代的英国作家，不但不会涂污莎士比亚和狄更斯，还要捧读他们的作品，尽管他们的流派不同，表达的方法互异。

以现实主义来说，其创作手法的对主题、人物以至于情节上采取它们的典型性。迈入十九世纪，它已倾向於写资本主义社会的阴暗面和歌颂新政体的光明面。和它持以异议的现代主义，则主张描写内部的真实，代替现实主义的外部写实。真理常常存在於两个针锋之间；真理再向前跨进一步就是荒谬，何况文学与哲学是两条不同的道路。文学的取向争论，唯有在融合之后，对抗的局面才会消失，产生新的文学

面貌。中国的文化就具有包容外来文化和延伸的能力。佛教东来，至宋朝大儒的阳明学说出现，融入佛学的禅宗而使文化再蜕变，从此结束了千多年的儒佛之争。

在台湾文坛，七十年代後期掀起的乡土文学之争以後，改变了文学的流向。这股文学动力，使文学宗派汇流，进而相激相成，产生新的文学形态。台湾作家从西征取经，接受全盘西化的“横的移植”，到东归后扎根于“纵的继承”，容纳乡土文学的现实主义成份，不论是形式或内容，都得到愉悦的相许。作为现代派文学前卫的现代诗，其内容已经从无现实走向有现实。《当代台湾诗人选》（一九八三卷）序文中，对台湾文学流变有这样的表白：“然而，台湾诗人在此时期的沉思及其后的转变，并不止於生活现实的省察，也包括了对过去诗坛现实的痛定思痛的省察，在内容和技巧上逐渐养成革变的意识，借着这方面的醒觉，把以往‘逃避文学’时期专注於‘怎么写’的理念转化为‘写什么’的态度。经此一变，台湾现代诗坛又步入另一个新的里程。”

序文中又说：“而继起的诗人，基本上是随着整个台湾的现实环境而成长的，他们对现实的关怀和认识拥有积极的态度，他们的投入，正好引导了诗坛‘求变’的情绪，把诗人对社会现状的责任视为一种文学态度，以作品做为实践。”

事实上，马华文学的现实主义写作者也在创新，他们也融合现代主义文学的成份，像吴岸的诗和韦晕的小说，都在锐变，出现新的写实主义的风采。在六十年代，致力于介绍现代文学主义的前辈作家黄崖先生，侪辈中听他主讲现代文学主义像意识流、存在主义等文艺课题的，为数不少，我也是其中的一个。我们可以从他发表在文艺春秋版的小说见到，黄崖的作品绝不受制于弗洛伊德的心理学说和沙特的存在主义哲学，而是活脱于其内外，再提升出来，用自己的声音，反映生活，批判人生。如果说黄崖的作品也具有新的写实主义的成份，也不为过吧！

美籍华裔学者作家刘绍铭博士，今年一月初参加第二届新加坡国际华文文艺营时，在访谈中指出：只要中国政府对文学采取比较开放的态度，大量新佳作必定涌现，成为世界华文文学的主流。基于向传统文学认同，我们不但要读中国三十年代(1929-1937)的新文学著作，以免造成文学断层，更要阅读中国古典文学，以吸取丰富的养份。刘博士的话很有见地，可供我们参考。

当代文学虽以白话为主，但行文和内容也需借助於古典文学里头的语汇、语法、语气、事例及论说等等，来增加篇章的密度和弹性。否则，我们写出来的白话文，白是够白了，

清楚也够清楚了，就嫌噜苏、拖沓，不够简练。可是行文要做到文白相融，却也不是一件容易做到的事。现代文学，绝不只是形式新，写蹦蹦跳跳和一点纯情的东西，实在还需披沥内心深处的意识活动，逼视现实的生活。文学是应社群的需要而产生的，离开这基本的要求，文学就要交上衰运，为群众所遗弃。

马华文学创作一向都没有脱离社群，不论是在抗日卫马、反黄反殖等各个时期，都以文章报国为己任。马华文学对关心社会这方面，或因受到政令的约束及流派的笔端取向，出现间歇的减退现象，但总的来说，它是关心社会的。

“风物长宜放眼量”，纵观世界华文文学的发展趋势，我们可以看到它的清楚前景，不再混淆不清了。马华文学与世界文学相互交会之下，当以达者为师，从而提高本身的创作水平。只要不陷入别国的文艺路线，当可保持马华文学的独特性，站立马华文学的形象！

14.4.1985 南洋商报文星文学周刊

《关心社会与提升创作水平》专栏

犁出校园文学的春天

1.

校园刊物是笔耕的沃土，勤加耕耘，必定可以犁出校园文学的春天。

早在50年代，我国华文中学纷纷出版校园刊物，使校园文学蓬勃滋长，春意盎然。读书促进写作，写作带动文运，这些都是相辅相成的事儿。

当时办得出色的校园刊物，有巴生兴华中学的《兴文文集》，马文甲培风中学的《新苗》，麻坡中化中学的《嫩芽》，北马钟灵中学的《学报》和《沙漠风》，亚罗士打华侨中学的《兴中月报》等等。当代马华作家当中如吴天才教授、马汉、刘祺裕、年红、陈雪风、沙风、邓日才校长及游牧等位，都在校园刊物中发表过作品，进而跨入文坛，赓继马华文学的命脉。

再说得远一点，台湾在60年代，校园文学成为现代主义文学的重镇。学生在校园结社办刊物，从事创作和译介的工作，犁出了文学的春天。这些作者群当中的白先勇、丛苏、欧阳子、刘绍铭、叶维廉等如今都是成名的作家了。到了70年代，另一批土生土长的生力军又在台湾校园内崛起，他们是陈映真、黄春明、杨青矗和王拓等，都以乡土文学的著作为人所称道。

文学随时代而变异，它与人生互相依附，因此，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

我国的校园刊物虽然在60年代之后相继停刊，但一迈入80年代，很多华文中学的刊物都先后复刊了。而国中的校园刊物更是如春笋般纷纷地抽长起来。马大华文学会自1987年获准注册以来，便展开了一系列的文艺活动，包括从事创作和出版书刊的工作。

我们应该重视各地的校园刊物，发展校园文学，发挥文学的大用。

2.

文心行健，民族精神必然焕发。学习语文，必须与文学结合，因为文学蕴藏民族的传统精神，有富有生命力，使人爱不释卷。

校园刊物大多由各校的文学会出版；爱屋及乌，我们应该加强文学会的组织，推动文艺活动，以便提高写作的水平。各个文学会之间也应该紧密联系，互通声息。

我认为提高校园刊物的内容素质可分两方面来举行。第一，通过举办文艺活动，增进对文学的认识；第二，勤于创作，从实践中提高写作水平。

关于举办文艺活动方面：①华文学会可以经常举行文艺讲座，邀请马华作家作专题演讲，以便吸取创作经验。②举行读书会，推介好书并交换读书心得。学生所阅读的书籍除了文学著作之外，也包括史地、科学、心理学、社会学及一般知识性的读物。③办壁报，鼓励创作。④举办文艺营，让各校学生参加，既可增进彼此间的感情，还可以聆听教益，实践文艺理论。⑤学生也应该经常参与校外的文艺活动，诸如董总属下《中学生》月刊举办的“校园刊物编辑研习营”，马来西亚写作人（华文）协会（现已更名为“马来西亚华文作家协会”）举办的“写作讲习班”及南马文艺研究会主办的“青少年文艺营”等等活动。这些活动，都有助于提高创作水平。

关于学习创作方面，学生必须经常练习写作，才能进步，写出好作品来。学生学习语文的目的，无非是为了提高表达能力。教师为学生授课，不论是讲解内容，赏析章法，或是学生阅读进修，遣词造句，甚至应用标点符号，就是要提高表达能力，为作文服务。写作是复杂的思想劳动，也是学习语文方面的一个高层次活动。学生必须不断的练习，才能达到写作的高峰。有师长从旁指导，必定进步得快。从学习得来的东西是一种知识，懂得应用才是一种能力。

3.

为文不能无章法，否则作品就不叫文章；孔子也这样说过：“言之无文，行之不远。”

写作虽没有公式可套，但文章的结构和条理还是有规律可寻；王若虚清楚地告诉我们：“定体则无，大体须有。”

作品的题材来自生活，但生活并不能成为文学作品，作家只是利用生活的真实部分，附上想像和联想，再经过转化、提升和剪裁的艺术手法而写出作品来。我鼓励同学写新鲜的小题材，只要文字流畅，妥加安排（结构），常常会出现好作品。因为写作最可贵的是有自己的声音，从自个儿的体会和观察而又有所发现。有些流传下来的诗词短文，写的都是小题材，但却是顶鲜活的，又富有艺术价值。

语言是运载题材的工具；没有良好的语言，就没有好作品，有的人生活经验丰富，却无法用书面的语言表达出来，岳飞和文天祥就能应用良好的语言写出传诵千古的《满江红》和《正气歌》。

老舍是中国近代的作家，也是语言大师。他的名著《骆驼祥子》写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正是中国辛亥革命后时局恶劣的时期，老舍通过黄包车夫祥子的悲惨命运，写

出故都北平的时代面貌。

老舍长于北京，对北京的环境非常熟悉，可是为写《骆驼祥子》这本书，他用了四个月的时间和黄包车夫走在一起，体验车夫们的生活。因此《骆驼祥子》这部小说就具有真实感和时代感，语言更是丰富、生动、传神，但却是通俗的。大家不妨找他的著作来读一读，你就会佩服他的语言特色了。

好的语言，是以口语为基础，又写得流畅、生动、更符合语言的传统习惯。文学语言和实用语言是有差别的。文学语言讲究形象化，要求生动、鲜活。实用语言则是平板的，人云亦云的。譬如新闻报道和应用文就不是文学作品，因为它们的文字大多是实用语言，缺少“个性”。

以上所谈的大多是创作上的话题，都可供同学们借镜，进而提高校园刊物的内容素质。

我们期待校园文学的春天早日到来。

5.8.1988 星洲日报文艺春秋

注：1-3.8.1988 董总《中学生》月刊与马六甲培风中学联办、南马文艺研究会协办“校园刊物编辑研习营”。地点：马六甲培风中学。本文是作者受邀于八月三日在该研习营主讲的讲稿。

“五四”七十年

1.

五四运动肇始于一九一九年，到今年正好七十年。它由早两年的新文化运动推波而来，至五四掀起怒潮，全中国为之澎湃。

中国长期受帝王统治，人民生活在封建社会中，因此中国文化最欠缺科学与民主的精神。在语言方面，文言文已不能适应时代的更大要求，也必须穷变求通。当时世界列强持枪登陆中国，扬威耀武，知识份子们对丧权辱国的事，无不感到痛心疾首。他们认为振兴国家之道，首先必须革新文化。

一九一四至一九一九的新文化运动，严复、梁启超、蔡元培、蒋梦麟都是闯将。一九一七年，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和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则是招展鲜明的大纛，为新文学运动冲锋陷阵。诸子百家的争鸣，更为民初的学术思想启蒙。迨至一九一九年，新文化运动推起了五四文学运动的高潮。当时的文学的共识，是动力的所在，一触即发。

2.

五四新文学运动的中心思想是：（一）建立“活的文学”。

（二）建立“人的文学”。前者是以鲜活的白话文为文学创作的工具，后者是以新的技巧和内容进行文学创作。换句话说，这就是胡适所提倡的以“文学的国语”创造“国文的文

学”。我们必须从大处去看待五四运动的意义，继承它正面的精神和内涵。当时文艺界前辈对文学艺术的积极、严肃和忠实的态度，是多么执着。

五四运动之后，中国内乱外患蜂起，时局不靖，五四的原动力受到分化，不过它的精神仍然存在心人。此后，大陆和台湾的政权隔着冰封的海峡，各自为政，舟子不渡。两地的作家都在不同政治意识的影响下，为文学织锦。

台湾作家在六十年代用“横的移植”介入现在主义文学作为创作的手段，至八十年代以“西而化之”回归文学的传统怀抱。大陆作家也取法“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信条，为文学延伸传统。两岸文学已在八十年代汇集在一个共同点上，真是可喜可贺，这对建立华文文学的共识，提供了多么有利的条件！你说，今年的五四运动七十周年纪念日不是特别有意义吗？难怪余光中教授于今年一月廿六日在马六甲的演讲会上郑重地说：“两岸作家在交流之后，应该尽早建立文学的共识，这比统一中国还要重要！”

3.

晚近两年来，世界潮流趋向交融互会，东西方的关系逐渐改善。暖流回归，两岸之间的海峡也在笑声泪影中解冻。台湾政府准许人民前往大陆探亲，中国也打开门户让作家外出，与世界其他地区的作家聚会。星星相会，星空分外明亮；文学交流，波澜更是壮阔。现在，世界华文作家们都忙着用

文学建筑桥梁，也忙着建立文学的共同灯塔。

文学超越政治，作家们所服膺的是文学成就。在文学世界里，没有卅八线或十七线的界限，大家可以尽情地驰骋。唐诗吟哦于两岸，《红楼》遍传中外，都是好例子。在取决于“西而化之”和“洋为中用”的之后，廿世纪的西洋文学，必定可以融合在中国的传统文学里，进而建立文学的共识。文学的共同价值观一旦建立起来，譬如水泥之于沙石，必定可以凝结起来。五四就凭着共同的新文化价值观而展开复兴文化的使命，至今依然没有失传。

文明的发展，是人类欲望和需求乘积后的得数。这个积数促使经济发展和互赖，以至于相辅相成。学术引导人生，科学改善民生；文化的厚实，也是学术与科学不断累积起来的成果。七十年来的白话文变得更加优美和纯净，现代文学也发展起来了。因此，五四所揭橥的两个内容要点：提倡科学与民主精神及发展新文学，依然是大部人的文化共识。

序开新岁，至一九八九年，五四的春秋已届七十。我们在缅怀前辈作家为新文化和新文学尽瘁时，除了对他们致以敬意之外，更期待世界华文作家，继承和发扬五四的精神，早日建立文学的共识。

1989 年峇株县拿督文达拉鲁哇
国中华文学会会刊《灵窗》之九

花开的容颜

今年四月间，星洲日报主办“花踪国际文艺营”，我忝为“花踪文学奖”复审员，受邀赏花去，满怀欢喜。

在马来亚大学讲堂内，我听到名作家论说文学的机杼，有如珠玉落盘，享受了身历声的耳娱之乐。

痖弦有深厚的文学素养，又善于演讲，他把抽象的文学理论形象化和趣味化了，实在好听！四月十八日，花踪国际文艺营移到新山去，痖弦在那儿主讲《诗的生命透视》，我又欣赏了另一朵诗花。

痖弦说，诗是从感觉而来的，而儿童的感觉特别敏锐，写诗最好从儿童时代开始。儿童不受成人的名言世界所约束，反而容易挥洒情思而产生诗的意念。做诗人得保有童心，从名言世界里挣脱出来，才能写出好诗。

他又说，关于写诗这回事儿，常常是年纪大的写不过年纪轻的，学问多的写不过学问少的。这是因为诗不是从学问来的，诗是从感觉而来的；不过，诗写得最好时也可以变成学问。至于写诗的三个要素是思想、想像和音律，就必须融合成为一个整体而呈现出来。

痖弦的精辟见解，符合儿童诗的创作原理。这就是为什么先进国家鼓励儿童写诗，并且把它作为儿童学习语文的一项活泼数学活动。

童心的流露，表达了人生真实的一面，令人感到亲切写诗是主观意识的表现，然后才形成诗人独有的风格。杜牧的“蜡烛有心还惜别/替人垂泪到天明”和杜甫的“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不都是主观意识的产物吗？

儿童即兴式的创作思考活动，虽然未必像成人的那么周详，但主观意识却很强烈。他们把意念转化为诗的语言。像台湾小四的张永沂写的《为什么有两个耳朵》就是一个例子：

我有两个耳朵
非常有用
一个听进去
一个跑出来
要不然
耳朵听的话太多
脑袋会爆炸

这首儿童诗，给小学生读来，会觉得小诗人“说”得“有理”；成人听来，也感到这首诗有“哲理”。他们都会一致表示：耳朵这“通道”可真要得，不然我们都没命了。

最近，我读了中国的“全国少年儿童诗歌竞赛”中部分

优秀的诗作。诗中呈现了生机盎然的世界，显露了童心、爱心和诗心之美，这证实应弦所言不虚。像这首《我爱那边的草地》，其想像非常奇妙，诗是从敏锐的感觉而得来的：

小山那边，
有一片草地。
昨晚一颗星儿落在那里，
又一颗星儿落在那里。

早晨，
我向草地跑去。
寻觅到朵朵蒲公英，
还有金色的小蜜蜂。

昨夜掉在那片草地上的星星，竟变成了今天早上的蒲公英和小蜜蜂，意象真美。小诗人的“想当然耳”的主观意识，化为诗境和情趣了。从诗中也表现了儿童热爱大自然和乡土的感情。

请看《我爱阳光》这首童诗：

亮亮的，
暖暖的，
手儿捧不住，
臂儿搂不住，
阳光啊，您真好，
不管是大窗，
还是小窗子，
您都愿意进去。

阳光愿意走进千家万户，照亮人间——太阳大公无私的形象站立得多么高大，小诗人开朗地歌颂太阳。

小五女生写的《鼠年，致老鼠》，也是好诗：

我喜欢你们——
一双机灵的眼睛，
粉红的耳朵。
虽然爱做坏事，
可我还是喜欢你们。

如果我到了你们的王国，

一定要你们
洗脸、洗手、洗澡、刷牙。
还要教会你们
自己劳动，
干事不要偷偷摸摸。

我还要给你们
介绍个朋友——
它的名字叫猫。

小诗人明知老鼠“爱做坏事”，却还是喜欢它们。她要教育老鼠养成好习惯，不要干偷偷摸摸的事；更要老鼠和猫化敌为友，小诗人的想像在在都是出人意表的主观意识。这就是儿童忠于自己的感觉和感情的表现，又饶富童趣。

“诗是从感觉而来的”——儿童有敏锐的感觉，他们写的诗也就显得别致了。

痖弦又说：“诗是语言的花朵”，我欣赏了花开的容颜，也像诗一样的美！

24.5.1991 星洲日报星云

后记

收在本书内的作品，是我近十年来思想劳动的歉收成果。这些作品当中，有我的散文创作和文学散论，都显露了我对生活和文艺的热爱与诚意，更有殷切的期望。

蒙前辈作家姚拓先生和著名诗人吴岸先生为本书写序。序文中的溢美之辞，对我是鼓励和鞭策，他们都要我好好地再学习下去。

我感谢马来西亚华文作家协会资助出版费，青年摄影家温昭隆兄提供摄影佳作，画家浩于豪兄设计书页，年红兄贡献宝贵的意见，使我把出书的辛苦工作完成了。

谢谢大家！



设计：浩于豪（画家）

封面：温昭隆（青年摄影家）



九十年代马华文学丛书①⑦

夹起一片故乡情

作者：梁志庆

出版：马来西亚华文作家协会

PERSATUAN PENULIS-PENULIS ALIRAN CHINA
MALAYSIA

40-3, Jalan Vivekananda, Off Jalan Brickfields,
50470 Kuala Lumpur.

Tel: 03-2745388

印刷：益新印务有限公司

PERCETAKAN ADVANCO SDN. BHD.

23, Jalan Segambut Selatan, 51200 Kuala Lumpur.

Tel: 03-6269211, 6270699 Fax: 03-6270761

版次：一九九二年十月初版

定价：M\$8.00

版权所有



九十年代马华文学丛书①⑦

蒙志庆，一九四二年出生于麻坡。日间师训学院毕业后，即任教职。业余积极从事文学创作与文艺活动。

他擅写散文和诗歌，近期更致力于儿童诗的创作、理论建设及教学活动。

他的散文入选《新马华文文学大系》及《当代马华散文选集》。多篇散文作品被选为华文独立中学及国民型中学课文。一九七九年他获得马来西亚华人文化协会文学奖之诗歌奖。一九八三年获得马来西亚福联会散文优秀奖。一九九〇年再获福联会颁给儿童文学优秀奖。一九九一年担任星洲日报《花踪文学奖》复审员。

著有：散文集《向阳的生命》、《黄花乡镇》，散论集《给马华儿童文学扎根》，童诗集《彩虹桥》、《海的小儿女》，另编著数种儿童文学读物。